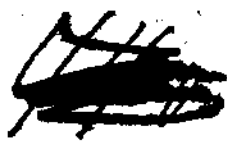


299



湖北論壇

時事評論

人家叫我們抗議.....	文什
聞皮爾遜將獲釋有感.....	石公
論官僚.....	曉淵
我國對外匯率釐訂標準評議.....	吳慶和
六月經濟漫談.....	黎少岑
中國的薪水階級.....	王方白
胡適先生對於青年的訓示.....	彭石
關於湖北人(之一).....	顏悉達
關於湖北人(之二).....	夏兆廉
走向農業機械化的前途(續).....	黎少岑
詩二首.....	西
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學生運動(時論選輯)	

第二卷

7

湖北論壇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



人家叫我們抗議

文什

一手把日本打倒在地下的美國，現在又一手把日本扶立起來了。麥克阿瑟佔領日本的種種措施，說明了這個事實，並且有美國人輿論的指摘為證。

美國人發行和編輯的密勒氏評論報，最近針對日本重整軍備的企圖，發表了一篇措詞很直率的社論。大意說日本正密切注視國際局勢的演變，以圖利用每一機會從中漁利。這次提出設置武裝軍隊十萬人，和建立小規模空軍的試探，便是因為看準了華盛頓的一些患着對蘇作戰神經病的人，都希望有一個強盛的日本，以為美國在亞洲對蘇作戰的跳板。據說美國政府中大部份人都抱有這個復興日本的觀念，這個觀念雖然不見得能夠得到美國人民的支持，但「不管事態如何演變，其結局可能無損於日本的期望」。因為「美國那些頭腦清楚而有理智的人們，難於影響美國的對日政策」。

美國的對日政策就是這麼一套，也用不着再加什麼說明。總之美國在對蘇備戰的觀點上，把日本的可利用的價值估計得很高，日本也處處迎合這種心理，一步一步的試探，一着不着的成功，例如大選問題的解決，賠償限度和工業恢復水準的擬議，都是美國認為得計而根本於日本有利的。有了這些，日本可以等於沒有打敗仗，一個強國的底子還是維持着，至少是比中國不知道要勝過多少倍。但這個美國人是不管的，正如只要日本沒有海軍，就是建立了可以替美國打蘇聯的陸軍，雖則不定在什麼時候會來打中國，美國也是不管的。自然，日本建軍問題，尚須經過盟國的同意，始能在對日和約中有所規定，但是麥克阿瑟處置日本問題，一味武斷，有例在先，恐怕美國要堅持這一問題的解決。

假定美國支持日本實現了建軍的要求，我們承認日本陸軍在對蘇作戰時，能為美國所利用，但必須附帶一個條件，就是美國一定要能夠打勝仗，並且一直勝到底，如若不然，就不能保證日本不拿美國所給的武力資本來作新的投機，老實說，日本只知道自己要強起來，並且未必不記着美國打敗她的仇恨，一有機會翻身，她眼裏是不會有美國的。然而美國一部份有力量的軍人和反蘇份子，為了要利用日本來對付蘇聯，却不顧及這個政策的賭博性，甘願冒將來日本反手的危險。不過，美國必定不願意幫日本建立海軍。這就是說，美國現在支持日本的做法，純是一派先顧好自己家裏的安全，然後到處引火燒人家房子的態度。將來日本果真反手，真正受

害的，定然是太平洋兩岸的一些國家，不是美國，這就是美國放心大胆扶植日本的一個深刻的心理原因。因此，有人說美國現在的對日政策正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對德政策一樣的短視，我們認爲比喻不切。那時英國在自已屋門口玩火，真是由於短視，現在美國在太平洋兩岸玩火，却是完全出於極端可鄙的自私。

密勒氏評論報說，美國人現在已經無力阻止美國政府實行這樣的對日政策，「唯一的希望只有靠太平洋各國大聲疾呼的反對……像中國，澳大利亞甚至菲律賓，今天都有足夠的資格提出抗議」。這真是不知從那裏說起，火已燒到中國的眉毛尖上來了，中國人自己已不着急，倒是美國人在旁邊急得躲脚，並且幫我們出主意。不過這種情形也很可以不必奇怪。對於這件事情的正式抗議，是中國政府的責任。既然美國政府的對日政策，不受美國「那些頭腦清楚而有理智的人們」的影響，則中國「那些頭腦清楚而有理智的人們」，也自然沒有力量要政府對美國的政策提出抗議，雖然抗議是十分必要的。

聞皮爾遜將獲釋，有感

石公

據舊金山廣播，曾在我北平強姦一大學女生，被判處徒刑的皮爾遜，竟將獲開釋，實令人感覺驚異！首先，這可見得果如林語堂所云，外國也有臭蟲。爲了敷衍表面，對於早經開釋的人，實際上却限制他的自由；對於那應該收押處分的人，反而任其逍遙自在；這一種自欺欺人的作法，想不到在美國也有。皮爾遜在中國犯罪，回到美國，就準備開釋，欺人乎？抑自欺乎？

其次，是則幾天在美國法庭裏開釋了好幾個強姦黑女的罪犯，現在這一寬恕又將臨到皮爾遜的頭上來了。黑女至今還得不到平等的待遇，怎對得住林肯總統？而堂堂中國的大學女生也同樣得不到平等待遇，又怎對得住提倡民族主義的孫中山先生？

誰無諸姑姊妹，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消息如屬實在，我們便不能緘默地忍受，人格要緊，國格更要緊！望美國友人，慎勿在這些地方，有傷我中美的兄弟之誼。

論官僚

曉淵

官僚的發生及其性質

不論是君主貴族地主的政治，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既要有入替他們辦事，則不得不設官分職，這就有了官僚機構，從而官僚以至官僚系統就可能，且必然要漸次養成。不過君主貴族政治下的官僚和資產階級政治下的新官僚，二者的產生與作用等不盡相同。然在作用上，無論舊的和新的官僚，要各為各該時期的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則是一樣的。而且，凡是官僚，其本身利益必各與其統治階級的利益相結合為不可分。

舊式官僚一瞥

在封建君主專制時代，一因「恩自上出」，二因君上喜怒無常，官吏們保障太少，所以這時雖有官僚，但很難成為系統。迨承平日久，文官制度有建立的要求，由於茂材異等，博學鴻詞一類的推舉，以及科舉制度興了，有了「座師」，等等，這樣，門生故吏漸多，官僚成為系統才有可能。論其作風，在精神上，則是畏天命，法祖宗，恤人言，習常蹈故，朝乾夕惕，以事一人或少數人。在形式上，則是坐有坐法，走有走法，語默動靜，無不有其一定格式，即所謂「儀注」，儀注不清，是不能作官，也不配作官的。（我二十幾歲時在北平，一次曾有機會見到趙爾巽先生，可惜對於這位老官僚中的典型人物，我在當時竟未加注意他的動態，例如坐法及水烟袋是如何拿法之類。民國十八年，在華陰縣與谷九峯老人同住數月，谷先生是前北京政府的工商部總長，國會名議員，也稱得起是一位典型官僚，他以其屁股之大而響為驕傲，據說這是彼時舊官僚場中一般的風氣。其指甲有長及一寸又半者，聞亦為個中人的擺設，與長髯一樣。）這種舊官僚的作用，一般的自然是為主上治理政事，管教百姓，有時應於必要，為制作朝儀，修明典章文物制度，并且一個傳一個，對於這典章制度的開架為看守人。至於這些開架之內

部是否已在逐漸腐蝕，他們又大抵是不管的，因為他們的目的原本只是大家作官。有時主子變了，改朝換代了，他們的官僚系統還能維持下去，像馮道竟能三番五次，當國秉政，就是例子。（這例子是很多的）。當官僚系統發展到兩個以上時，又嘗是互相傾軋，掀起政治上的波瀾，在中國東漢及明末的黨爭，其實就是兩種官僚系統的相爭，不過是在君子，小人，清流，濁流，閣官，重臣等等名義下進行。惟王安石與司馬君實之爭，則是政治家與官僚系統的相爭，與上述有別，漢時叔孫通陸賈之輩可謂官僚。霍光可謂社稷重臣，霍光王鳳都是皇親國戚，後來他們羽翼下的戚族盛極一時，然只可說是權門貴族，不可以官僚及官僚系統論。唐朝數百年宰相不出裴劉張李蕭杜數大姓，與其說他們是官僚，不如說他們為世卿，貴族豪門。吾鄂先正，唐時的張柬之與明時的張居正都算是重臣。我的意思，這些人物中，只有王荊公具有政治家若干條件（政治家與官僚政客之別見後）

當前的官僚之作風與作用

茲分為次列諸點言之：

一、是職業官吏

一生專門作官，視作官為職業，有豐富的作官經驗，有相當的作官能力，對於法令手續等非常嫻熟，他們的精力完全集中在這些上面。為了達到長久作官的目的，且必然結納為一種系統，以便互相提攜，彼此保障。

二、注重技術與形式

官僚們按部就班，準時辦事，注重技術，講究形式主義，其結果在外表上很似有秩序，有條理，有組織，有方案，很少有凌亂錯雜粗躁的表現。這也是他們作官的本領，能久於其官，形成系統的原因。這樣，在官僚政治下，調查表統計之類下行文件是很多的，公文曾在「旅行」中，有名無實

的計劃書及方案之類也非常之多，行政效率是低的。

三、講究資歷

官僚們是多由一定的資格，經歷和學歷進身的，所以他們也以此種種來就一仕途，維護自身的系統，不使倖進的或由他們視之不够幹練的人滲入。也由此，他們要維護考試制度與銓敘制度。投身仕官的人經過多次的考試與銓敘，弄得精氣神火氣與熱情，甚至血性都沒有了，只剩下對於作官的技術與形式主義倒學得非常之嫻熟，這才够得上官僚們之所謂幹練。由是經過大官僚的提攜，加入了官僚系統。

四、是現狀維持派

官僚和官僚系統是在現狀下進身并成長的，并且他們是統治者在政務，特別是在事務方面代表辦事治民的人和組織，所以他們是與統治者的利益結合爲一，必然以維持現狀爲有利，爲目的，那是沒有問題的。所以他們總是順着現狀辦事，追逐於形式技術之末，必要時，頂多執行一種溫情的改良主義。官僚與官僚集團當然是不革命的，而且是革命的障礙；不過在尚穩定的資產階級的政情之，官僚們濫職、枉法，過分腐化的事，也是很少的。

五、善於適應環境與風氣

官僚們工於揣摩，善於適應，不論何種政情與風氣，在其維持現狀原則下，都可以多方變通以求適合的。圓滑週到，本是官僚特長的以及特別練習的技巧與本領。除此之外，他們還懂得忍耐，沉默和假性地獲取價值，這使他們能委曲奉就週圓的情勢。而且他們有較多的常識，亦使其足以迎合并適應各種變化，苟有必要，他們甚至可以偽裝一種和平與民主的姿態。

六、是政治上第三線上的人物

官僚們埋頭治事，精心着意地作官，絕不爲天下先，絕不輕易發表政論。其實他們也本無什麼大政上的具體意見，有時發言，也只是模稜其辭。他們經常是伏處在政治第二線上，隱身在政治內幕中，所以政治的風浪是打擊不到他們的，這也是其經驗之一。但當他們站到政治最前列或第一線時，這

固然意味着他們的當權之盛；可是也徵兆着他們是要受打擊了！

官僚與其他官吏政客及政治家等之不同

我不以爲凡是作官的都够得上稱爲官僚，而以爲官僚只是在衆多官吏中備具上述諸特性的少數人物。這也就是官僚與其他作官的不同之處。稱入爲官僚與被人稱爲官僚，雙方相習都感到有輕蔑之意，其實官僚之爲官僚也并非不是很容易的事。在爲自己升官發財這一點上，官僚與政客是相同的。但在作風上技術上，後者只是把握一種機會，朝秦暮楚，指說得失，談言微中，可以立即作大官，然不旋踵間，亦可一敗塗地，像古時縱橫之士，朝爲布衣，暮爲卿相，一旦情勢轉移，又求退爲布衣而不可得，皆屬此類。可見官僚是穩妥穩打，政客則大抵是行險僥倖。就二者對統治者的作用說，官僚被是經常的工具，而政客只是供一時的策動。行險僥倖，供統治者一時的策動之用，以求由此以達個人升官發財的目的，這就是政客的眞面目。在政治動亂之時，政客可以翻雲覆雨，大顯身手；這時官僚們却只好袖手以待機會。反之，政治上安定了，官僚們可以飛黃騰達，政客就不容易逞其如簧之舌以取如斗之金印了。官僚是利於治，政客是利於亂的。當政治外表安定時，而有了政客的活動，這就可以看出政治的內部一定存在了一種什麼危機。這樣說起來，政客倒是一種不祥的人物。

政治家與官僚和政客是沒有相同之處的。政治家有其基本條件：

第一、政治家或是代表那時統治階級的整個利益，或是代表其所屬的社會階級的全體利益，或籠統地說，代表國家民族全體人民的利益，雖其中頗有分別，要均對之有其絕大的忠誠，這與官僚政客只以其自己一身一家的利益爲前提，爲出發點，尤其是與政客們往往爲完成其私人利益而不惜損害公衆（籠統言之）的利益，是絕不相同的。

第二、政治家忠誠地代表上述各種中任何一種的全體利益，并從而決定十年百年大計，釐定一種具體的政策和政綱以公開領導衆人奮鬥以求實現。

這是官僚政客絕對不堪與相比擬的。官僚們絕無百年大計可言，也絕不採用公開領導眾人的方式。政客也只是爲少數首要人獻策，自處於陪臣地位。

第三、政治家當其政策不能執行時，絕不會戀權位，所謂合則留，不合則去。去而在野，以從事與其政策相關聯的準備與活動。政治家也可以容忍；只要與其政策或主張的實現有裨益；更有其驕傲，倘若他的主張須打折扣時，他絕不奉就。凡此，那是官僚政客所能望其項背呢？官僚政客在政治家前是太渺小卑下了。

要之：政治家有其絕大的忠誠與遠見，有其『有所不爲』的風度與雅量。當那時的統治階層或某一主要社會階層還有其政治家時，那就可證明該等尚有前途；倘若沒有了政治家，那就證明該等已沒有了活力，沒有了明日——政治家是這樣值得讚頌的！

官僚政治的利弊

官僚與官僚系統是有其長處的。他們以服官爲職業，互相掣引，經嚴然守法循規，又奮立在政治後幕，不多受政爭政潮的影響，這一切都對於政治（行政，尤其是事務方面）的穩定上和國家文官制度的建立上，有其助益。一般的說來，濫職，耗法，貪污，腐化等等，他們大抵是想避免的，因爲，經驗告訴他們：公然的濫職耗法是於其長期作官的企圖上不利的。

至其弊，可分如次幾點說：

- 一、官僚們追逐於形式技術之末，外觀雖似完整，內在却漸就腐蝕。
- 二、他們兢兢於法令手續之遵守與周到，這當然是必要的，然而政令的執行則坐是缺少機動性，行政效力則坐是低下。
- 三、這更是要緊的：即官僚們必然障礙着并桎梏着政治的和社會的改進。當革命到來時，不管其中之少數人如何僞裝開明，亦必然是反革命的，反動的。

官僚與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原與資產階級當政的事實以俱來（或爲後者所產生），又即爲

後者的政治方式之通稱。但資產階級性民主政治并非一種類型，通常所謂的民主，大抵是指第一次歐戰前後的英、美、日本和民國成立後的中國等的民主政治而言，這在今日，可謂爲老牌民主，屬於民主的一舊的類型。本文以上所說的新官僚就是此舊類型的老牌民主政治下的官僚。在老牌民主政治下，官僚及官僚系統是可能發生發展的，而且如上所說，是已經發生和發展了。那是因爲老牌民主政治并非不置的民主政治，既然仍是以極少數人，統治極大多數人，勢必有龐大的統治機構，官僚與官僚集團便附麗在這種統治機構中以發生，發展，作了經常的且比較穩妥的統治工具。什麼時候吧，另一類型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政治到來了，譬如說，以工、農、城鄉中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等爲政權主體的民主政治（姑稱爲新民主主義政治）到來了，則官僚與官僚系統雖遲仍難逃不到將隨最後的清算（那是社會主義政治到來以後的事），但必然不免漸就削弱。其理由簡單說來，是：

新民主政治既比較是人民大眾的政治，則人民過問政事，監督政事的機會便比較多了，亦即官僚們玩法弄政的可能性要減少，這是一。新民主政治下當然講究政治效力與機動應用。對於技術與切合內容的形式，也必然注意，但不要玩法的技巧與虛僞的形式主義。官僚們是把服務公職當官做的，其奢侈浪費的手法與手續作風等是必然要遭受揚棄的。這是二。新民主政治將必對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不斷地爲各種可能的必要的重大改進，官僚們是障礙着一切改進的。官僚們倘不能削弱這各種改進，將必被削弱，這是三。尤有進者，新民主政治的性質是多數人聯合起來統治社會上另一方面的倘不能算少數的少數人，即革命統治反革命，顯然是官僚，顯然他們不能爲革命的統治工具，而將是被統治的對象了。這是其又一。

然而在現今這尙是老牌民主的政治之下，官僚與官僚系統無疑的是還要繼續存在着的！

官僚與貪污

官僚唯利是圖，自私自利，當然是不能與貪污絕緣。甚至貪污就是官僚的一種屬性。不過，自私自利的另一延長，是保持祿位，以求能長期作官。爲了企圖長期作官，在通常比較平定的政情下，又大抵是尚以人言爲可畏，對於公然貪污枉法的事，是還要盡量避免的。而且在安定的政情之下，官僚們普通（個別的在外）尚頗有奉公守法，循規蹈矩的表現，彷彿他們不僅是幹員，而且又是廉吏。但當政情混亂，踰出常軌之際，官僚們這一切僞裝便都解除了，是時，官僚的原來貪污的本性就赤裸裸地顯現出來。其情形約如次述：

一、當政治上鼎沸動盪的時候，官僚們存五日京兆之心，不免要趕快弄錢以爲下台後享受之資。

二、隨着政情的混亂，道德的危機也增大了，甚至人們的理智上亦漸潰滅，這時廉恥道喪，是非不明，一般人『笑貧不笑娼』，貪污之類的罪行也就肆無顧忌，恬不以爲恥了！甲乙既貪污而大發其財，大享其福，丙丁爲什麼不相率效尤哩！作官不發財，非愚即怪，如今是這樣可惡的風氣！

三、與革變亂之交，舉世擾擾，也實在增加了官僚們舞文弄墨，貪污作弊的勇氣與機會。在極度混亂情形下，法令是敗壞無餘的，官僚們是同此談法的，以云貪污，誰來檢舉？又何從清查？凡此的最大結果，亦不過幾隻蒼蠅遭殃而已！

四、至於由於規定的薪金之太薄，或由於物價之狂漲之壓已（此二者亦政情不安定的現象與結果），就中下等公職人員說，其所入不足以養廉，亦實貪污之一因。

以上四者，可視爲貪污之來源。至其後果是很顯然的：

一、行政效率惟有愈益低下；

二、國家法令，政治常軌以及社會道德等無不更加敗壞；

三、混亂的政治更加混亂；

四、疾苦的人民更加疾苦。

關於懲治貪污，我們知道，既然貪污的來源由於整個政情的失常，則可見懲治貪污的事，亦不是一件可以孤立的事。自中樞以至地方的各級民意機關，果真是名副其實，不折不扣，則對於貪污的檢舉，清查與懲處，是比較有效的。但若貪官與劣紳相結納，上下其手，則貪官污吏之貪污反更得有力的保障了！——不幸，事實上竟多是如此！

官僚與所謂官僚資本

由於貪污及其發展，官僚們擁有多金，又形成了所謂官僚資本（嚴格解說起來，這並不是一妥當的名辭，茲從略）。於此，當先一檢討及官僚們的貪污何以能積累成官僚資本。原來官僚之貪污的方式並不是一種一樣的。實官器備，偷工減料，對扣部屬，貪贓受賄，收支不實，以及吃空名額，監守自盜，諸如此類，固是貪污，但這已經是比較舊式的，又多是中下級官僚之所爲。至於新官僚，尤其是大的新官僚，則除此等之外，更有其他更大的貪污作法：

一、以公款放折息；

二、以公款做生意；

三、利用權位，或偷漏漏稅，或竟闖關抗稅以公然走私與公然包庇走私；

四、利用權位以取得普通商人所不能取得的外匯及交通工具（飛機、汽車、火車）等等；

五、爲了適合官僚們自身的需要，有時改變經濟上財政上的各種法令以從中取重利。經濟上各種措施方案及財政上各種改革計劃，往往含有豪門的利益與作用在內，幾乎每次是類的變革無不有便利若輩的因素在內；

六、利用權位以大量收售黃金及各種物資；

七、利用權位以壟斷國家公營事業；

八、利用權位以掌握國家各種金融機構如銀行及匯業局之類；

要之，凡此及類此者，無不是貪污。凡以公職公款圖謀私利者皆可視為貪污，而且是貪污之尤。這些年來，有許多達官貴人派遣親信，利用其在職的關係，專門多方營私謀利。這些年來，有許多有特殊勢力的人公然成立走私營商的遠征組織，國家交通設備成爲其私人轉運工具。而這些人不自以爲非，反自以爲得計，自以爲是堂堂正正之事，彼此見面，竟大談生意經，其他的人亦不以他們如此作法爲污貪，且交口讚美。某大官豪語衆人（我也在座）說：『不錯，我有錢，而且我有很多的錢，但我的錢沒有一文是由貪污得來；我不過是做生意得來，我自問對得起國家！』貪污之義不明，大家積非成是久矣！

官僚資本就是如此地積聚起來了。他們愈積愈多，爲害也就愈烈，舉其甚者簡言之：

一、貪污的官僚與官僚資本的活動必然使國家任何改善經濟財政的措施和法令不能徹底執行，歸於無效，而且有時適得其反；

二、官僚資本必然妨礙到正常的工商業者的工業生產事業（官僚們有優

越的地位，有更大量的現金，在國家的財政經濟金融機構中有他們的勢力，在捐稅的負擔中，他們又可以多方避免，凡是，都是所有正常工商業家所沒有的優劣條件）；

三、官僚資本通常是以大量游資出現在市面上，常常要引起物價的波動，市場的紊亂以及使走私與黑市的趨勢愈加激化；

四、官僚的貪污與官僚資本的活動最後都轉嫁到民衆的身上，民衆的生活愈益敗壞。

官僚資本的毒害至深且大，此處不能一一。當官僚們可以公然貪污，可以公然積聚并形成所謂官僚資本之時，這就可以看出這時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制力量甚爲薄弱，原來是統制工具的官僚與官僚系統，這時已進而爲統制主人的自身了。肅清貪污，清算官僚資本，反對官僚豪門，這些，緊要誠然是萬分緊要，但在當前動蕩且不安的政情下，却正是他們滋生繁榮的溫牀，惟有在政治上了新民主主義的軌道時，民衆的政權建立起來了，這才有充分的可能。而當官僚們拋棄其正常的官僚型作風，明目張膽地肆行貪污，且發展到形成爲興風作浪的官僚資本時，也正表示這現狀不僅是在不安中，而且不安到一真正的民主政權即將建立起來。嚴冬到了，春天還會太久嗎？

我國對外匯率釐訂標準平議

吳慶和

我國因有內戰，財政收支不平衡，引起通貨膨脹，目前全國物價平均已上漲至三萬倍以上，而通貨尚在繼續膨脹，物價也在繼續高漲中。自美鈔禁止公開買賣後，官方匯率與黑市匯率之差額頗巨，全國經濟更加惡化，其具體事實反映是（一）僑匯資金大量集中在香港。（二）正當廠家無法獲得工業原料，結果不能夠保護國內工業的健全發展；其連帶的影響，是社會上失業業者衆多，購買力薄弱。（三）政府實際上並沒具備統制外匯的必須條件，但在政策上卻要施行外匯統制，對於官定匯率卻願常維持不變。

在現時惡性通貨膨脹之下，國內有一部分經濟學者主張開放外匯市場，改變匯率來挽救今日的經濟危機。今後匯率究竟應當如何決定呢？前文（「我國外匯管制政策」載本刊二卷五期）早已經說過，此實為整個中國經濟問題，而其主要關鍵，全視內戰停止物價穩定實施訂匯率的基礎。但今日國內戰事緊急，我們更嘆息「和平」，那從參政會裏發出來的微弱呼聲，早已讓砲火湮沒了，我們必須承認事實，不唱高調，本文旨趣在匯率釐訂問題，至於匯率改變之後，能否模範弊害，卻不在範圍之內。

有人認為如果採行金本位可以使匯率穩定。這種流行的見解是不必需要的。從長時期看，金本位本身的價值也是不穩定的，例如根據沙倍克（Sapier）的物價指數，一八七三年一一，到一八九六年下降至六一，只是短短的二十五年間，黃金價值低落了一半。（參看加塞爾著「戰後貨幣穩定」五三至五五頁）事實上，自一九一八年歐戰結束後，各國已先後停止金本位，而改用紙本位。各學者也認定如果一國紙幣本位管理完善，結果價值會趨於穩定，那麼世界將有一種更滿意的貨幣制度了。故穩定本身並不是指通貨須與黃金價值相聯繫。

也許有人會懷疑紙幣本身僅是一張紙，本身並無價值可言。因受政府法

令保障，故能够在國內流通，這在貨幣價值論內稱為克那普（Knapp）的國家學說。但法幣一出國門，信用全失，於是產生了一個問題：即匯率在不兌現紙幣國家下如何決定的問題。

在還沒有更好的方法來計算匯率之前，各國已經接受了加塞爾所闡述的購買力平價學說，作為計算的標準。例如哈伯萊教授（Haberler）說：「這是一個唯一的能够算出具體結果的方法」。《看經濟評論一九四五年六月美國版三一頁》。所謂購買力平價，指在自由貿易下，由各國紙幣的購買力決定。例如一元美金在美國可購買之物品與中國法幣五萬元可購買之物品相等，即美國與中國之物價為1:50000，故兩國之匯兌平價亦相同，換言之即為五萬元法幣換美元一元。此即購買力平價學說的真諦（加塞爾著「一九一四年以後貨幣及外匯」一書）在紙幣本位之下，其比較者亦為一共通物，即兩國之貨幣對其共通之商品之購買力。

牠的算式可簡列如下：

$$\frac{\text{甲國物價指數}}{\text{乙國物價指數}} \times \frac{\text{甲國貨幣單位}}{\text{乙國貨幣單位}} = \text{平價}$$

據統計我國物價較戰前約漲三萬倍，但美國物價也上漲百分之六十，換言之，目前中國的物價相當美國約五萬倍，故美元一元應等於法幣五萬元，才算是合理之數。（算法： $\frac{\text{CNC\$1} = \text{US\$} \times 0.06}{30,000} = \frac{1}{50,000}$ （U.S.\$）

購買力平價學說本身缺點甚多，我們現在只願意提出下列幾個問題：

（一）何謂均衡匯率 依哈氏見解，這是一種能够平衡國際收支的匯率

（二）物價指數選擇的問題 我們主張計算我國的匯率應當採用國際物價的批發物價指數。採用這種指數最大的優點是因為使用外幣主要目的在購

買國際商品，故能準確測出匯率變動。不過國際商品與國內商品的區別尚難十分嚴格的劃分，且隨時間環境而轉移。（哈伯萊：「國際貿易原理」三四頁）。爲了要補救這種困難，其他一般物價指數如生活費指數，工資指數，國內商品物價指數，頗有參考的必要。

（三）基年的選擇問題 毫無疑問的我們應當以民國二十六年作爲基年，因爲在那個期間是一種所謂「正常狀態」，指生產消費貿易均不受直接的統制，且貿易也沒有受阻斷。

六月經濟漫談

黎少岸

這一個月的末尾是半年的結算期間，去年的「六底」風潮，會掀起了七八月間的倒風；在今年，無論看經濟，看民生，都不如去年此日遠甚，六底是否可能平安的度過？作算是能够平安地過去了，是否便顯示著經濟情勢之略爲好轉？均難令人有樂觀的把握。

看光景是一天緊似一天，失業和窮迫無依的人，姑置無論，假定現在有一個人在這裏，手頭還有點活錢，想經營一點事業的話，工業總不是最有利的出路，有些貨色，加工之後拿到市場上去出賣，反不如直接販賣原料之賺錢，如果當時進原料，當時加工，當時出賣的話，甚至於是還要賠本。這樣當然是只有去盤貨了。錢總是要跌的，貨總是要漲的，但爲了購買力的限制，形成銀根之一緊一鬆，使得物價未能一勻地上漲。每作微跌猛漲地躍進；國貨雖比存錢是有利得多。

我們希望用購買力平價學說所求出來的匯率，一方面能够維持所得與成本的機構，另外一方面能實行充分就業政策，這樣才能够協助我國工業化和促進經建大業。

總之在目前局面之下，調整匯率的具體辦法是希望中央銀行在一定期內以購買力平價爲基準，察酌外匯供求實況，逐日公佈匯率。並且設若每日匯率發生波動，設置外匯平準基金及繼續施行統制貿易消滅之。

可須要囤貨的人，在臨着物價下跌的時候，能够忍得住痛，撐得住拆息，不至於迫不及待地以賤價拋售出去。大魚吃小魚，誰的錢多，誰便最利於囤集；特別是現在這個時候，脫手比戰時要困難得多，市場的吐納胃口也日見縮小，手裏的存貨，越急於出脫，便愈難得按市價換出錢來。

囤積既然是有了限制，再便只有去跑生意了。最有利的生意，還是要針對着人民生活的要害出發，離不了食糧食油煤炭和棉花等項，可是要做這一類的生意，單憑本錢還是不行的，必須在大量收購時能够免却攻擊或統制；在軍事供應方面以官價攤購幾成的時候，能够規避處分；在軍運緊急，交通困難的時候，能够得得優先的運輸；在限制出口轉運的時候，能够取得特殊的允可憑證；再加上在營運期間之經濟上的幫助，諸如低利貸款與押匯之通融等等，一句話說總之，要辦

到這些條件，都非有公事場中的交接不可。在公事場中的上層，有辦法講情面論交接的，便大往大來，大做而特做；至於那些攀不上層的單幫客，也須有個和巡查稅吏們打交接的手腕。這裏便存在着官僚資本的實質，也就是說，官僚資本之取得領導的地位，不在於資金本身之屬於官僚，而在於資金之營運，與官僚制度之存在，有着相輔相成的密切關係。

在這一個月裏面，本市最有利的生意是運煤赴滬，獲利可達一倍以上；最倒霉的是運小麥來漢，行情是接連的下跌。單只就這兩種生意來看，都與民生主義的理想，適相違背；第一，鄉間糧商之蝕本，多少要減少農民的收益，而糧商之獲利，則表示財富之集中；第二，小麥進口無利，則來源減少促使麥價上漲，便宜了那些早先以低價進麥的囤戶；煤炭出口有利，則煤炭供不應

求，必趨高漲。又害苦了消費者。第三，麥價雖已低落，麵食依然高漲；煤炭漲價，煤球更隨之上升。因為零售物價，一向是只能隨躉售物價上漲，不容許隨意售物價下落；終歸是消費者倒籌。

經濟現象是如此，再看看幾個最近會形成爭論的，有關經濟對策問題：

1 發行新幣的問題

與六月一日發行新幣的謠傳同時出現了幾篇贊成斷然發行新幣的社論和專著，確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謠傳是不足為憑的，社論和專著之立言，多少總有幾分的根據。或者是出於一些善意的建議，像當初在匯率未變更以前，不是很有人主張變更匯率麼？結果每變更一次匯率，甚至於只要有一點變更匯率的風聞，便導致一次物價的波動和工商等的危機，以後再纔沒有一個學者肯作匯率變更的主張。當然這其中也難免有人是望風承意，以為事之可行，則在當局既有俯順民意之美，作者又復有言聽計從之榮；只是這樣一來，便更令謠言近於真實，揣測若有依據。

爲什麼要發行新幣，理由當然是爲了要整理幣制和停止通貨膨脹；但幣制之有待整理，與通貨之不斷膨脹，自有其必要的原因，新幣之發行并不等於解除了這些原因，在其他一切環境完全不變的前提下，來發行新幣，無疑地將會使新幣陷入舊幣的覆轍。

預算之不能平衡，與浩大的軍費開支之迫使通貨的增發，已爲公認的事實，在此時要談到改發新幣，既不能無視於這一事實，又無法改變這一事實的存在，於是乎便只有設法證明新幣之發行，無俟於這些事實的改變，且可利用來改變這些事實。

像這樣對於改發新幣的效用，予以過高的估計，也未嘗不可以；却也不能把它當着無時無地都可以發生效力的靈丹妙藥；就當前情形看來，便至少要在改發新幣的同時，還具備兩個必要的條件。

預算之不能平衡，原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的支出數是固定的，僅僅乎是入不敷出，可以作有計劃有限度的彌補。一種的支出數是不定的，由於物價之不斷增高，與軍事負擔之不斷加重，誰不知道究竟會用到一個怎樣的數目；因此也就很難得去作有計劃有限度的彌補。

改發新幣，縱可不必等待預算平衡了再說，但最低限度，必須要把預算數字確定下來。在新幣發行之後，即使可能限制物價的上漲，但決不能限制軍事負擔之不斷加重；故不謀改發新幣則已，要想發行新幣，首先便必謀改發新幣則已。

其次，新幣與舊幣之間的差別，如僅止於數字之換算，實毫無意義，徒增印製的消耗；所以有人建議仿照他國的成例，限期登記舊幣的持有量，按累進率遞減，換發新幣。這樣使得改發新

幣，兼帶一種徵課財產稅的性質，就稅論稅，第一，國家取諸於人民，必須用之於人民的福利；第二，就必須課得公允平當。這樣便又發生了一個問題：真正的豪門資本家是否便是大量舊幣持有者，持有舊幣的人又是否負擔得起這樣的課稅，在在都成疑問。而且，萬一有了這樣的決定，官僚資本家可能先便得到了消息，儘量把舊幣拋了出去；則一切徵課的負擔，就會完全落在一般中產和小康之家，甚至於是工薪所得者的身上。當官僚資本家還神通廣大，財富還沒有嚴密的統計，一切偷漏和舞弊還在所難免的時候，這一種以累進率遞減來換發新幣的辦法，是萬萬的實行不得。

再還有一個補救的辦法，那便直接是以徵收財產稅來代替遞減的換算，不過徵收財產稅也容易軍果中間階層或生產企業，真正的豪門資本，仍不乏逃避之方；關於財產稅這一點，留待下文再作討論；現在所要指出的，那便是不問用方式來賦予新幣以某種不同的實質，總要有辦法將一切損失，均歸不事生產的富有者擔任。

這兩個條件不能具備，則新幣之換發在當局既爲欲鳩止渴；在人民則身受舊幣之交換損失，與物價的因幣制變更而猛漲的實禍。

2 所利得稅恢復查賬核定的問題

所利得稅原曾採取簡化稽徵的辦法，改由各同業公會攤認，現在又恢復到查賬核定了，就理

論上來說，簡化稽徵，有近於攤派，漸失去按比率征收之實，有時爲了增加稅收，便不免有高估或任意加倍征收之處。這樣以執行的辦法，來變更訂立稅法的原则，本屬不當；但事實是事實，理論是理論，要查帳核定，首先便須要有帳可查。

無可諱言的，今日各工商業中，很少採用新式的會計紀錄，而且那些保有會計紀錄的單位，又多屬正當的企業；這樣一來，便只有正當的企業有帳可查，也只有這些正當的企業，才有查帳人員的用武之地，一切挑剔實難都集中於正當的企業經營，試問這對於國計民生將招來一個如何難以補償的損失。

一回生，二回熟，虛盈實施已經是够數的了，要加上逐筆挑剔，雞蛋裏算出骨頭來，已經使用了的消費，還要剔除課稅；這等於是逼着人去造兩套賬，單拿一套假帳來對付查帳人員。

出去查帳的人員，當然總要查出點兒毛病，才好回去銷差，被查者自不勝其擾。真正有毛病的，內愧在心，情願說情了事，也許還可以包涵一點；反而是那些真實情況作會計紀錄的，便難免理直氣壯，甚或開罪於查帳人員，招來更多的挑剔。結果又剛好是那些在正當企業中，有明確的會計紀錄的單位，最爲吃虧；如是則不僅減低人民之從事於正當企業活動的興趣，抑且使人心趨向於爾詐我虞，更敗壞社會的風氣。

至對那些沒有帳可查的主戶，查帳人員，既有上下其手之權，便難免不發生些漏洞。

所以自從查帳制度恢復以來，上海始終尚未實行，迄在研討之中。最近聞已決定依照標準計稅，分級抽查核定，準備在各業中各只抽登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似已對查帳制度，打了一個折扣，採取了查帳與同業公議之間的折衷辦法。因爲既以各業爲對象來分級抽查，自免不了要聽取一點各同業公會的意見。

爲兼顧理論與事實，像現在這樣有時要課取收益的半數以上，甚或爲了剔除費用，把課稅數竟增加得比那原報的收益，還要多上一倍左右的情形，似須加以修正。對於帳面上的虛盈數字，課以實質的貨幣，即如古者之什一而稅，猶覺其重；何況於達到半數以上；確有背於「藏富於民」的至理名言。假定這一辦法是絕對公平的，那還有點道理，事實上對於游資或逃避海外之資金的收益，每難予以征課；徒只與正當的工商業以種種的挑剔和留難，殊難得其平。

值是百業凋敝之時，對於正當的工商業，正宜予以多方的獎掖，對於各正當工商所提供的報表和申報數字，即使有認爲不足信任的地方，也應該聘請會計師秉公查核，免得讓查帳人員去直接查閱，多生糾紛。如果認爲所有一切的報表，都不足爲憑，則互信不立，以後的麻煩更多，在這些地方，希望當事者多多地從大處着想。

3 綜合所得稅和財產的徵收問題

據報載滬市徵收綜合所得稅已經公佈達十年之久，仍無法開徵，無論要每一戶的戶主來申報所得，或者是由稅收機關去挨戶查核，都將是不勝其擾。

綜合所得稅是在征收過分類所得稅之後，再按綜合數所課之稅，包括（一）營利事業投資者所得，（二）薪給報酬所得，（三）證券存放所得，（四）財產租賃所得，（五）財產出賣所得，與（六）一時所得的綜合數字。

現在幣值是一天低落一天，各戶主所得的絕對數字是增大了，而比較其生活享受，則反而日趨低減；這時候，即單按分類所得稅繳納，已感有虛益實稅之苦，如再加上一起徵收較低的綜合所得稅；別的不說，首先便要加重薪工所得者的負擔。

例如在物價上漲一倍之後，某職員的薪給得增加百分之八十，論理其實質的薪俸收入，已相對地減低，便應該減低其課稅的負擔，乃按稅則，如原薪五十萬元，應繳所得稅二萬六千元；現薪九十萬元，應繳所得稅六萬六千元；稅收與所得之比，反由百分之五十二，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三。此時如再征收綜合所得稅，那所用以維持生活的必要金額，便不得不越來越少。

綜合所得稅自六十萬起徵，即平均每月收入在五萬元以上者便須課稅；所得達五十萬元以上

者便停止累進，即月入在四百二十萬元以上者便一律按超過額征課百分之五十。照現在的幣值看來，起徵點既未免太低；爲了要把負擔多加一點到豪富的身上，累進的級距，也還得要拉長一點。

再談到擬議中之財產稅的徵收，據聞是對土地之在五十畝以上，與財產之在三千萬元以上者

課稅，並對人及法人徵收。將來征收的情形如何，目前自難逆料，但恐對動產仍無法徵課，結果僅由那擁有不動產的廠商和地主負擔。果屬如此，又放鬆了豪門資本，而重累了那有着不動產的工商業者，殊難達到徵收資產稅的目的；且有礙於正當工商業之發展。

看看經濟情形，研討一下現有的對策：萬變不離其宗，總是中產者和小康之家，與正當的工商業，處處不討好；而官僚資本，以及那和官僚資本有着依存關係的經營，處處得佔便宜；這樣促使財富集中，貧者益貧的趨勢，實值得關心民生的人士，予以密切的注意。

中國的薪水階級

王方白

假如有一天，美鈔貶到百分之十的時候，我們可以斷定美國一定會發生很大的風潮，那將是怎樣的一種情形，恐怕是不能想像的。因爲美國的長期幣制穩定，美國人已經習慣於一種計劃經濟的生活，他們的薪水階級都可以把自己的收入，計劃分配，作一個預算。他們有娛樂的費用，有旅行的費用，有捐款的預定額，也有一定的儲蓄。這在中國薪水階級是辦不到的。

的主动性，其他大部分中下級作何人員，只能過一天算一天，明天如何今天是不敢說的。像這種現象不但影響一個人，一個家庭，而實在間接受害的却是整個的社會和國家。

顧名思義，薪水階級是靠了固定的薪水爲生活的，這裏面包括各級公務員，學校教員，商店店員，公司工廠之職員等，我們現在還缺少一種詳細的調查，沒有調查，講話難免不準確。但我們可以這樣說，在名義相同，工作相等的彼此之間，他們的薪水差額往往很大，比如書記，一個鄉公所書記和一個市政府的書記，自然有天淵之別，人們視爲當然，不以爲奇，可是，同爲中學教員，省級和縣

級待遇不同，同爲報館編輯，官辦與民營待遇不同，同爲大學畢業的資格，作工務員和當教員待遇不同，又和公司職員不同。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要說一個大學畢業有三年工作經驗的人，每月可以有多少收入，這句話是很難講的。假如有個朋友在機關裏做職員，而你打算知道他的每月收入的話，那你至少需要問他三句話：

第一句，是委任幾級？或薦任幾級？
第二句，是縣級、省級，抑或中央待遇？
第三句，是在南京、上海，還是漢口，還是重慶？

照這樣看來，今天要調查一下中國薪水階級的收入，那必然是一番很繁重的工作了。

我想不說這個問題。可是因此而生的一種現象，却值得我們注意，那是工作情緒的不穩定，無恆心。要推究這個原因，還必須先說另一個問題，即薪水階級的生活簡陋現象。

一個人的生活，包括衣、食、住、行、樂五項，但若有個家庭的話，就必須加上父母妻子的生活費和兒女的教育費，一般的薪水階級在這各方面是否能應付裕如呢？對不起，這兒最好有一份詳細的調查統計與分析，但我們沒有這東西，姑且杜撰一個例子：

中國人民一直生活在一個混亂的國度裏，「計劃」兩個字，根本說不到，能够依照自己的意志安排生活的人，佔極少的一部分。在薪水階級中，就只有少數上級人員還可以有部分

張先生，三十歲，在漢口任中學

教員（或公務員），每月薪水五十萬元，他有一個母親，一個妻子，四個孩子，自己沒有住房，是花錢租來的。現在讓我們替他支出分配一下看：

：吃，平均每人每月四萬五千元，小孩四萬元，共二十九萬五千元；穿，每人每月兩萬元，小孩一萬元，共十四萬元；住房，每月七萬元。算了，不必再往下說了，單是這衣食住三項合計就是五十萬五千元。比他的收入超出五千元。我們看，四萬五千元一月的伙食，能不能吃的好？不能；每人每年廿四萬元的衣服費，够不够四季添置衣服和鞋襪？不够，但此外還有燈水費，有坐車費，有應酬費，有郵費，有醫藥費，都沒有着落。像這樣的人家，就必須屋裏不燃燈，出門不坐車，永遠不看戲，不看電影，親友間婚喪喜慶概不應酬，不生病也不吃藥，經年不寫信，除了站在牆下看壁報外，不買書，不看雜誌。小孩子也不讀書，至於旅行，儲蓄，向外捐款更說不到。

老實說，這個例子也許誇一點，為什麼一定要有四個孩子呢？難道那位太太也不能做事麼？是的，即使除

掉三個孩子，那情況也不會好了多少。即使把祖母降為老媽子，在屋裏看孩子，讓年青的太太順利地有個工作，那情況也不會好多少。

中國薪水階級的生活簡陋，實在不是一個小問題；吃不飽，穿不暖，健康會受影響；不看書，不看報，思想會落伍；沒有娛樂，精神會沈悶頹喪，兒女不能受到充分的教育，下一代受了很大的摧殘。沒有儲蓄，生活便毫無保障，終日惶惶，惟恐失業，這無論從那方面看來，其損失是無法計算的。

你沒有這樣的朋友，他在甲機關工作，却天天打算離開職位，另謀高就？這樣的人恐怕極其皆是，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收入不够維持他的生活。生活壓着他，逼着他，他便覺得換個地方也許可以好一點。其實他不曉得，即使換個工作，也未必好。

既然不安於位，那工作態度也就可想而知。目前有大多數人不是在做事，却是在混事，混了一天算一天，「當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還算是庸中佼佼呢！這如何能求工作效率？人都都存一種「五日京兆」的打算，那

結果就決不止打算，在工作中經常調換人員，成了極普遍的現象。就人方面看來，長期從事某一工作，積累經驗，加以研究改進的專才，成為鳳毛麟角；從事的方面看來，因為沒有熟練的工作人員，往往浪費了人力財力與時間；又因了主管人員的流動性大，就常常朝令夕改，或者半途而廢；往往堆了許多新舊計劃，或工作紀錄，因為人員更調的緣故，計劃永遠是未完成的計劃，紀錄也無人整理，不能汲取過去的經驗，作為改進工作的張本。

這，都是社會的損失。還有另一種現象，那和上文所說，恰是反面，工作人員並不打算離開他的崗位，然而却不是對工作有熱情，他們所熱心關切的，只是上級長官的位置穩不穩，情緒好不好。這個關鍵是在於他們具有一種特殊的生活哲學。第一、他們認為作事是爲了吃飯，而飯碗是別人給的（甚而可以說是賞的）。第二、他們認為靠了學識技能而生活，是沒有保障的，也不會有發展的，有保障有發展的辦法是靠定一個人，給這個人作下屬，永遠跟着

他。只要他有辦法，自己不愁無辦法；只要他有升遷，自己不愁無升遷。那麼這個人是不是經過嚴格的擇選呢？不一定，那多半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當初偶然碰到一起了，因了偶然的情形，獲得賞識，提拔，於是就靠住了，跟定了，再也不離開他。

這種「跟人主義」在中國的歷史上，大概是淵源很久的，現在我們不需要在這方面多加研究，比如說還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啦等等。我們覺得還是只知道有上司不知有社會的態度，所以，這樣的工作人員決不管工作的社會價值，而只是應付上司，上司說辦就辦；上司說好，也跟着說好。那工作就會等於報銷，只要上司滿意便是上上。甚而爲了取得上司的歡心，就不惜在工作報告上做得花團錦簇，而實際則一場糊塗也沒關係，因爲這是「瞞上不瞞下」的。

用工作報告以逢迎上司，進一步，就用禮物賄賂來逢迎上司。我們從「跟人主義」中，可以看出中國官僚政治的一面。說到賄賂，那就進入中國薪水階級的另一種現象了，這便是今日中國政治的最大毒瘤——貪污。

用工作報告以逢迎上司，進一步，就用禮物賄賂來逢迎上司。我們從「跟人主義」中，可以看出中國官僚政治的一面。說到賄賂，那就進入中國薪水階級的另一種現象了，這便是今日中國政治的最大毒瘤——貪污。

用工作報告以逢迎上司，進一步，就用禮物賄賂來逢迎上司。我們從「跟人主義」中，可以看出中國官僚政治的一面。說到賄賂，那就進入中國薪水階級的另一種現象了，這便是今日中國政治的最大毒瘤——貪污。

由于中國薪階級收入的菲薄，又由于惡習相傳的「跟人主義」，二者合流，造成了貪污的現象。

貪污是官僚政治的必然產物，下級爲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要給上級送禮；爲了博得上司的歡心，隨時提拔，也要送禮。然而薪水收入有限，生

活尚不够維持，那裏來的這些錢？只好弄些不義之財，方可以做爲自己向上級投資的資本。既經投資之後，那收穫就在升級，調任，或者位置穩如泰山。這也可以繼續貪污，備積更大的資本。這也算是再生產了吧？然而

却都是向社會剝削來的。

但他們也不能把眼光專注於此，有些人的貪污行爲，還是應當歸之于收入太少，生活困難。那就等于餓肚子的人作小偷一樣，拿「外快」來應付生活了。這樣說，並不是要替這樣人原諒，我們只是指出一種現象而已。

中國的薪階級，自抗戰以來，

便陷于窮困，「調整待遇」問題，到現在還是一個頂現實的財政問題，也是社會問題。而這個問題又和現在積極提倡的「人事制度」，備受攻擊的「貪污政治」都有關聯，如何解決，不宜再緩。因爲薪水階級是一個社會上的中堅階級，在推動社會進步中，有極大的作用，不應當被忽視的。

胡適先生對於青年的訓示

彭石

二十餘年前聽過胡適先生的一篇演講，當時會發表了一篇反駁胡先生的文章，事後想起來，很是後悔；那一來是有點年輕荒唐氣盛，二來是以一個未出國門的青年來反駁堂堂的洋博士，也難免不蒙「蚍蜉撼大樹」之譏。現在，我也「心

情微近中年」，當然更耍心平氣和多了；然而在捧讀胡先生的近作「青年人的苦悶」之後，又不禁提起筆來，想爲一切在苦悶中的青年，懇求我們的胡先生，說兩句真情實話！

據胡先生文中所述，事情是這樣的：在六月二日早晨，有一個北大一年級的學生寫了一封信給胡先生，胡先生摘錄如下：

「生自小學畢業到中學，過了八年淪陷生活，苦悶萬分。夜中偷聽後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國勝利，在深夜時暗自流淚，自恨不能爲國作事。對蔣主席之崇拜，無法形容；但勝利後，我們接

收大員及政府所表現的，實在太不像話……

失望，且會一度悲觀到萌自殺的念頭。……

「自四月下旬物價暴漲，同時內戰更打的起勁。生親眼見到同胞受飢餓而自殺，以及內戰的慘酷，聯想到祖國的今後前途，不禁悲從中來。原因是生受過敵人壓迫，實再怕作第二次亡國奴……」

「我傷心，我悲哀，同時我絕望！」

「在絕望的最後幾分鐘，問您幾個問題。」

從這上下的文氣看來，其中所節略的地方，會些比較對於現實更爲不滿的申訴。六月二日是各地學校發生慘劇的第二天，北大一年級生又曾身受過女同學被美軍強姦的公開侮辱，此時此地，這一位瀕於絕望中的青年，應是如何地想法，如何地寫法，明眼人不難一望而知。

他之所以肯於這樣直率地寫給胡先生者，未

必完全是因爲在絕望中無所顧忌；多少是還對胡先生的學者態度，有幾分的信任。看光景他又有了自殺的動機了，胡先生當夜回了他一封一千多字的信；至於此信之爲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抑爲暫時令人沉湎麻木的麻醉劑，實屬疑問；

依胡先生自己的說法，他那回信中所寫的，「都是我心裏要對一切苦悶青年說的老實話」；現在我們所就心的，就是看胡先生到底說出了老實話來沒有？

那位學生一共提出了七個問題，胡先生也許是爲了避免言論之過分地自由，另挑出了三個；那三個是：

一、國家是否有救，救的方法如何？
二、國家前途是否絕望？若有希望，在那裏？請具體示知。

三、青年人將苦悶死了，如何發洩？

對於這三個問題，千言萬語，胡先生都是「一言以蔽之」地拿「努力」二字來作擋塞。

一、救中國的方法是「努力」，譬如說，究竟是努力和「不努力」呢？還是努力戰爭呢？胡先生不僅沒有指出；而且在通篇中簡直無一句談到有國內戰爭存在的這一事實。那一個學生本是爲了不滿意於現實才發生苦悶的；而胡先生的答覆，如是除去了那些不相干的時序記述之外，豈不知那是在個什麼時候，處於一個怎樣的環境之中所寫出的文章。

二、國家前途的希望，其「具體示知」，還是努力。努力者，工作不懈之謂也。諸如劫收，戰爭，攤派鎮壓，等之努力，是否亦爲中國之希望，似仍缺乏具體的指示。

三、青年們苦悶死了，如何發洩，又不外乎努力。努力之功大矣哉。只可惜青年們在這些方面實在是在懂得太多了，跳舞賭博等等，便均會被利用爲發洩苦悶的努力。

努力！努力！是胡先生貫徹一生的主張；聽着趙元任先生所譜的胡先生「上山」一詩，使人興奮，那「努力向上爬」的旋律，激動着每一顆想向上努力的心！但相反地，胡先生的「已做過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卻令人替胡先生汗顏無地，感覺到那是一種自甘墮落，寧願愈陷愈深的解嘲之詞。「努力」而至於「拚命」，其爲「努力」也抑已甚矣！同爲胡先生所歌頌之「努力」其所給與的印象，猶如此之正相反對：胡先生即欲「以身作則」，也應該說個明白，教青年學生們學他老人家那一個「努力」的榜樣。

因此，可以斷言，胡先生「心裏要對一切苦悶青年說的老實話」，也不過是「拚命向前」之一表示而已！譬如說「種種苦痛都是從前努力不夠的結果」，這話值得「一駁麼？如果說戰禍是苦痛，那麼胡先生是否要去鼓勵學生去努力作反內戰的運動呢？又如說我們「沒有技術人才」，那在公團中自縱的雜道不是在國外深造歸來的技術人才麼？

原文中全篇只有一點好像是談到現實的，即謂「現在的幾個強國，除了一個國家還不能使我們完全放心之外，都絕對沒有侵略我們的企圖」，胡先生是最不願對政治問題公開表示意見的，這一個國家究係何指，我們無從測知；但就胡先生對皮爾遜強姦大學生案，在中國公開地判罪，在美國竟悄悄地開釋的這一消息之表示失望（「離苦悶不遠矣！」）而言，幾令人懷疑胡先生亦有「反美」之嫌。

胡先生親眼看見在審訊中強姦案之確實成立，胡先生至今仍信任美國法律的尊嚴；不料在事實上不僅法律尊嚴是難以信任，連自己的親眼所見也不能信任了，胡先生亦感覺「苦悶」而思有所「努力」否耶？

是非不明，節義不講，此天下之所以亂也。

——胡林翼

其言雖美，不能見諸實行，猶雜草之充滿庭園。

——英國諺語

關於湖北人（之一）

顏悉達

一、題前的幾句話

此文之作遠在數年以前，作者在某大報得見一文，公開侮辱我們湖北人，其內容較之閒話揚州的侮辱揚州人，其侮辱程度，更加幾倍，我們看了當然有些不平，不平則鳴，必然之理。後來商之於同鄉們，想聯名做一篇反駁的文章，給他一個迎頭痛擊，奈他們都是富有唾面自乾的美德的，不願洩此悶氣，我也便孤掌難鳴；自後，類似這樣的文字在各地，不時發見，同時在各地的外省人士，輒於閒談的時候都不自覺的這樣公開的說着「你們真是九頭鳥，難怪別人瞧不起你們湖北人」。同鄉們聽見了，至多也不過相與嘆息而已。不久以前，世界書局所編的袖珍地圖，對於我們湖北人，又公開的侮辱着。於是我們湖北人這次確爭了一個氣，並組織了一個「全省人民反侮辱運動委員會」來爭取，大家也都叫吼起來了，也可以說我們湖北人從此進步了，但我們只空空叫吼，還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事實上有所表現，因為人家之所以敢侮辱我們湖北人，實在由於我們湖北人本身有許多缺點，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因此作者這篇文字的眼光，絕對不是和別人爭那些閒氣，在別人算賬的意味，而是在為多數湖北人爭人格，也希望由此對

付別人而轉移到勉勵我們自己，進而達到健全我們自己，想也不是無的放矢的事吧！

二、歷史上的湖北人

春秋之世，楚國的文物制度，並不在中州諸邦之下，如令尹子文者流，孔子曾稱道不置，自後立霸爭雄，楚莊與桓文競勝，而曰：「天方授楚，莫予爭也，而吾楚模範人物，首推屈原，屈秦逐鹿，三楚亡之，故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繼陳涉吳廣之項王與漢高祖齊名，南方之強，北方之強，都不過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一種說法，誰也不能自詡獨為上帝的選民，況且人種混合為社會進化的源泉，不管他用夏變夷也好，用夷變夏也好，只要是一變再變，繼續的變下去，終於會夷夏不分，楚之鬻熊，吳之泰伯，原沒有定下什麼永遠清濁攸分的血統，那麼，千百年後，誰是誰的先祖，誰是誰的子孫，根本就無法判明，假定我為楚人，安知我的祖先非吳人，爾為吳人，又安知爾之祖先非楚人，籍貫是隨時可以轉變的，又誰能自詡獨為神明的華胄呢！若說這是地帶的問題，不是種的問題，那末，請言其地，荆沙挹長江之勝，襄樊枕漢水之流，魚米聚於雲夢之澤，不必新時代的地理學者，讚揚湖北居中國之中，最擅勝概，就是古之談形勢者，西望夏口，

東望武昌，也未嘗不徘徊於斯土曰：「美哉江漢也」，山川靈毓所鍾，蔚為人文之秀，這也是事理所必然，古人有言，「惟楚有材」，這句話自然是被認為是過分的誇張，但無論怎樣顛倒的說，總不會說到「惟楚無材」，翻開一部二十四史看一看，歷朝的名臣名將名賢名儒屬於湖北籍的，並非少數，「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事實如此證明，這又何會是過分的誇張？

三、革命過程中的湖北人

「湖北佬是最不革命的一居然有人這麼說，這話沒有事實的根據，却有他們理論上的根據，好像是說「九頭鳥當然是反革命的」，至若武昌首義的這回事，在他們也只承認還是會逢其適，不見得這便是湖北佬的功勳，鐵的事實，被人家悄悄地抹煞了，難怪彭劉揚三烈士之血，不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血，那麼寶貴，不過你若問到辛亥年革命的首功，到底是誰，我還是只能根據正確的事實來答復，但我也不能妄說參加過一次流血運動的，完全是我的同鄉，但最少也有百分之九十是被別人認為最不革命的湖北佬，會幾何時，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鄉同志都到那兒去了呢？我告訴你吧，他們的出路，有的是和彭劉揚三烈士一樣的命運，永久的做了無名枯骨，有的

是和張振武方經等一樣的命運，爲反革命勢力所中傷，砍了腦袋之外，還被加上一個搗亂份子的罪名，這就是武昌首義以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鄉同志，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一個真象，我常見着大批的辛亥革命傷兵同志，落拓到衣食兩缺，不得已而向着後來居上的革命家所主持的政府，討一碗剩飯喫，討一件破衣穿，亦不可得，他們雖則是敢怒而不敢言，但面色上終不免有些倖倖然。

四、民國以後的湖北人

由武昌首義而建立了這個中華民國，固然沒有被人承認這是湖北革命者，流了不少的血，換來的一點成績，但湖北人自己問自己總算盡了他相當的責任，橫豎革命的這回事，是不必索取報酬的，別人承認不承認，原沒有什麼相干，不過革命的目的，雖不在乎索取報酬，但至少也得要爭取自由與平等，然則湖北人流了這麼多的血，究竟得着自由平等沒有，這恐怕只有天曉得，你看辛亥革命以後來了一個安徽人的段祺瑞，湖北便成其爲安徽人的湖北，來了一個山東人的王占元，湖北便成其爲山東人的湖北，來了一個河北人的陳嘉謨，湖北便成其爲河北人的湖北……他們雖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湖北人却老是和德國境內的猶太人一樣，於是有的人說「這只怪你湖北佬自己不爭氣，沒有自治的能力，」我不遲疑的答復他，說我們湖北人失了自主權，這是事

實無法否認。若說湖北人獨無自治能力，這可是斷難承認的，民國雖已是三十六年頭，但湖北人得着自治機會，除僅只有民十六七年那個最短的時期，那時張知本做湖北省政府主席，嚴立三張難先石瑛劉樹祀做民財建教四廳長，再加上胡宗鐸做軍務督辦，我不能恭維他們是怎樣特色的人才，但他們實心實意給湖北人做了一點事，這是不能不認的，他們把紛亂如麻的湖北，整理得近小康，這也是不能否認的，那末，如果假他們更長的時期，給他們以更多的便利，我相信業已走上軌道的湖北，必有更好一點的進展，又何至還是現在這麼糟呢？惜乎他們求治的心理太切，應世的工夫又太差，鬧的一着之錯，滿盤皆輸，這真是言之猶有餘痛的一件事，不過事後思君子，日久見人心，只這一塊拿錢買不出的口碑，總算給鄂賢以治鄂，留下個不可磨滅的證據，其實鄂賢之賢，豈僅能治鄂而已哉。內而贊襄中樞，外而周旋異國，文而司理教育，武而寄重邊陲，隨時隨地露其頭角者，正復大有人在，這是從好的一方面說來的，至若說到壞的一方面，誰也不能担保某一個地方，絕對沒有壞人，我們對於湖北自也不能例外，可是就壞人而論壞人，又該有個首從之分，多寡之別，我敢說民國以來，窮凶極惡之人，在湖北還不多見，如擁兵自立，割據稱雄，建立不易剷除的惡勢力的大軍閥，這是在湖北找不出的，搜刮民財，侵蝕國庫，動輒以百

千萬計的大貪污，這是在湖北找不出的，勾通敵入出賣祖國，其影響足以危及國本的大漢奸，這是在湖北找不出的，老實說，在湖北有名可指的好惡，至多也不過鷄鳴狗盜之徒，以言殃民，誠有餘，以言禍國，則不足，然而這是個竊鈞者誅，竊國者侯的時代，湖北惟其沒有元惡驕首，也正是給人家瞧不起的原因之一。

五、武漢地方的湖北人

愈是對過湖北的人，對於湖北佬的印象愈壞，這好像是耳聞不如目見的一件事，其實一般人所謂到過湖北，祇不過到過武漢而已。武漢固然是湖北的一塊地方，但是把武漢人認作湖北人，把武漢社會所有的罪惡，都看作湖北人的罪惡，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重大的錯誤。我是個湖北佬，同時也是個老武漢湖北人，與武漢的關係我自然知其大概，很久的過去，也許湖北人在武漢做過唯一的主人翁，但時代的嬗遞，和事勢的轉變，這主人翁的地位，湖北人早就退讓了，時至今日，至多也不過敬陪末座而已，如何還能以主人翁的資格，代四方來賓受其過呢？不信的話，請作一個具體的檢察，試問把持武漢的金融，擾亂武漢的市場，號稱爲奸商的，有幾個是湖北人，試問歷次破獲的大烟案，大賭案，大翻戲案，以至大劫掠案，這一類的好民，有幾個是湖北人，試問窮奢極慾，異服奇裝，造成社會淫靡之風的

，有幾個是湖北人，自然不能說這些社會之蟲，在湖北是絕無或僅有，但我相信這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被別人帶壞的，着實太多，不然，但只離開武漢，走到湖北任何一個地方，何以就不會看見這些人的踪影呢？可見把武漢社會醜態完全寫在湖北人賬上，這未免太冤，我記得有一次某名人在武漢演講，承他的好意，對於湖北人，期望甚殷，但他指摘武漢的一個人力車夫，說他如何如何的壞，結論竟引此以為湖北人之戒，這種舉證的方式，雖不見得是有意侮辱湖北人，至少也可說他不合邏輯，這個人力車夫不是湖北人，根本就是疑問，就算他是個道地貨的湖北人吧，難道說抓住一個壞的車夫，就可以斷定全數的車夫都壞嗎？難道說抓住一個壞的武漢人，就可以斷定全數的武漢人都壞嗎？難道說抓住一個壞的湖北人，就可以斷定全數的湖北人都壞嗎？執全牛之一毛，而推論全牛之肥瘠，豈非天下的大笑話，笑話固自笑話，但湖北人喫這一類笑話的虧，着實喫得太多，所以湖北而有武漢，人們常引為幸，我是常引為大不幸，無他，湖北人代武漢而受過，未免噁子喫了黃連，說不出的苦頭。

六、湖北人的特性及其原因

不單是湖北人有特性，任何地方的人都有和別的地方的不同的特性，這多半是基於地的特

殊條件而產生的，特性的成因，既是適應他自己生活的環境，自無所謂優劣，不過山內在的特性，而發生外界的反應，這又是事理所必然的，因反應的關係，常容易被認為其為優點，其為劣點罷了，明白了這個道理，才可以談湖北人的特性，一、湖北因氣候溫和，地勢平坦，無枯燥峻急之象，故其人之稟性，大都屬於中和，惟其中和，就有優劣的兩種看法，自優點說，他是愛好和平，守分安命，沒有偏激的主張，沒有搗亂的意念，是國家最能守秩序的好羣衆；自劣點說，其人缺乏剛果沉毅之氣，意志又不堅強，最容易為有力者所征服，在得過且過的限度下，不容易表現他對抗的力量。二、湖北因地居全國之中，又沒有天然的界劃，為之限制，故其人鄉土的觀念，異常淡薄，這也可作優劣兩種看法，自優點說，破除畛畦之見，省却許多彼此扞格麻煩，自劣點說，內則失其團結，外則失其聯絡，無論在內在外，老是表現着一盤散沙，被人輕視，而遭致侮辱，這也是必然的結果。三、湖北因人口密度太高，交通又特別的便利，故其人，大都勤於向外發展，這一樣還是有優劣兩種看法，自優點說，是最適合於近世紀人類生活的條件的，雖處於最惡劣的環境中，他終能打出一條生路來，自劣點說，易犯舍近而圖遠的毛病，熱中於意外的收穫，而忽視厚生之道，且到處熙熙攘攘，輾易與多方面發生衝突，這也是招致他人厭惡的一個

重要原因，基於上述種種情形，我敢以最客觀的態度，對於湖北人下一個公平的總評判，就是湖北人富有中華民族的調和性，而缺乏中華民族的建設性，富有進取力而缺乏持續力，求望高遠，而不能改其成法。為成見所矚蔽的人們，但知吹毛求疵的指摘他的劣點，却完全忽視了他的優點，這就我們說，是失之於不平，就他們說，是失之於不明。

七、今後的湖北與今後的

湖北人

過去的湖北無庸諱言的是一個糟字，過去的湖北人，無庸諱言的是一個苦字，這都叫做既成事實，再也用不着說了。我們所企求的，當然只在今後的湖北，再不要繼續的糟下去，今後的湖北人，再不要繼續的苦下去，要達到這種企求，該怎樣辦呢？關於前一個問題，我覺得這不單是湖北人的責任，乃是全國人共同應負的責任，關於後一個問題，這可是湖北人本身的事，用不着仰望於別人，現在請分別說明理由。

湖北地居全國的中心，人們把他比作人身的心臟，這是再恰當也沒有的，心臟司全身血液的循環，湖北對於全國，恰是負的這種責任，假如心臟有了病，長久不治，其人必漸次衰弱，而至於死亡，反之，病重之人，到臨危的時候，給他打一強心劑，有時也還能起死回生，這些情形，

在湖北也恰正如此，當辛亥以前，各地方無數次的革命，總歸失敗，單只武昌首義，便告成功，這原因雖不十分單簡，要以地的問題，最爲重要，因爲革命的勢力，既佔據了全國的中心，才能使得全國興奮，才能使得各方互助，這便是打強心劑的一種妙用，這種成功的必要條件，是斷然不容人們忽視的，惜乎民元以後，這健全的心臟，竟被毒血侵入了，於是整個的國家，就常在不幸的狀態中，不過病根潛伏於內，未能引起人們充分的注意，一直到抗戰時期，大家才知這病象的嚴重，而發起所謂護心運動，但亡羊補牢，已悔其遲，就地理論，武漢本是當然的政治中心區，文化中心區，經濟中心區，平時人們不肯承認，這時可由不得他們不承認了，中心區不健全，全國的一切當然都表現着不健全，這不健全的責任，是應由湖北人獨負呢？還是應由全國人共負呢？說來話長，現在姑且不算這一筆糊塗賬，但只就這一次的喫虧而論，顯然不僅是湖北人單獨的喫虧，那末喫虧，既是大家都喫，改善當然也要大家共改，所以我說改善今後的湖北，這是全國人共同的責任，至若怎樣改法呢？具體的問題在這裏，是一時說不了，不過有幾個先決問題，是應該提出來，請大家特別注意的：一、大家應

切實了解湖北所處的地位，是與整個的國家興亡攸關的，不但不可歧視他，並且不可漠視他；二、大家應正確認識湖北人，是富有調和性的優秀人羣，決不如某報所言湖北人具有劣根性；三、大家要拋棄私見，和成見，竭誠的與湖北人合作，必使得湖北人對於他關係最密切的鄉土多負一點責任，我相信這三點，是最合理的要求，這三點如果做不到，任是怎樣的談改論湖北，都是廢話，湖北不改善，要想中國得到安全，那更是夢想了。

在整個國家尚未得到膏貼的狀態中，和湖北人一樣受着痛苦的，自當不在少數，不過我們既知道湖北所處地位的重要，這心臟麻痺的症狀，是不容許長久存在的。西哲有言：「天助自助者」，湖北人受的苦痛，若不力求自救，而希望天助，或人助，這是斷然不會成功的，所以我說，這是湖北人本身的事，用不着仰望於別人，自然有人會說：「現在的湖北人，早是手無寸鐵，如何還能談到自救？」這是對於自救二字有所誤解了，要知所謂自救的意思，絕不是要對於任何方面來一個惡意的對抗，而是要針對着自己的病態，來一個痛改前非。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湖北人之所以給別人瞧不起，而受盡許許多多有

口說不出的苦頭，這其間自有他必然的原因，能力的薄弱嗎？不是，品性的惡劣嗎？不是，生活的窘迫嗎？不是，其實這原因，我在前面早說過，還不是由於湖北人自己不長進，內則失其團結，外則失其聯絡，無論在內在外，老實表現着一盤散沙嗎？孟子說，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湖北的所謂賢能也者，一貫的是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甚至於還要中也欺不中，才也欺不才，兄弟老是鬩於牆，而忘却外禦其侮，又安得而不爲有力者各個擊破呢？又安得而不教人家打上頭，罵上門，而沒有還手還口的餘地呢？我們固然不可存着絲毫的封建觀念，主張什麼湖北者，湖北人之湖北，但至少也該保持着平等自由之精神，主張湖北之人，應與其任何一省之人，立在水平線上，我們固然不可存着絲毫自私自利之見，主張結黨營私，但至少也該站在精誠團結的立場上，以愛國家的觀念，而愛其鄉土，親愛的湖北同鄉呵！我所說的，自信都是天公地道的話，是爲自己爭出路，是爲子孫爭人格，也正是爲整個的中華民族爭光榮，請你們自己想一想，你們也是國家的羣衆，你們也是祖宗的子孫，是不是應該這麼樣？

關於湖北人

(之二)

夏兆康

我們發表這篇意見的真意義，並不是有什麼畛域之偏，門羅之見，來分化湖北人與非湖北人，更不是數典我們湖北祖宗的美德善行，來誇耀於世。恰恰相反的，是想化除過去的畛域之見，來融合湖北人與非湖北人；是想披露我們湖北人過去傳統的錯誤，來痛改自己的前非，以與非湖北人相見。誰也知道，在這個原子世紀開端的年頭，不是過去門羅主義，個別主義，所能生存得下去的，而是要有一種「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真正精神，使社會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樣，去達到平衡狀態，然後人類社會才能保持和平與安甯於永久，然後能保證社會生命於永存，必如是，人類才能共存共進於世界，否則自我毀滅而已！這就是我們發表此文的動機，也就是我們發表此文的意義。

過去湖北在歷史上佔有地位的人物，提不勝提，過去，湖北就是楚，楚就是湖北，我們在這裏，可以提幾個歷史上足以代表湖北人的特性人物，來承認我們自己，來責備我們自己，這些人物是誰呢？第一個，我想把春秋時楚國三閭大夫「屈原」提一提，屈原與上官大夫同事楚懷王，我認為湖北人雖然在好的方面，無人能比擬得上「屈原」，不過屈原對於楚人，其身後影響於

楚人者，實深且大，而其所著之「離騷」，可以說是我們楚人的一部「顏氏家訓」，所以我們湖北人的思想，多少是以之為中心的，太史公在史記裏有一段話說：「上官大夫與屈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譴之曰：『王使屈原為令，參莫不知，每一令出，原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原，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舜，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適，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諫，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

，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我們讀了太史公這一段文字以後，我們認為千載下，只看太史公肯在他的褒貶春秋中替「屈原」說了一些公道話，也不管是替「楚人」吐了一口氣，但是我覺得楚人祖宗的好處，我們不必提。世人也會知道，這裏我要說同老夫子有一個缺點，這個缺點是什麼？就是一個「癡」字，「癡」，固然不是什麼不正的評語，可是總有些正而不中在裏面，譬如說：他以為世人皆濁而我獨清，一不見用，便去被髮行吟，不聽漁父「不凝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之言，而以憂以鬱以死，此非「癡者有所不為」而何？他既無能力「推移世俗」，又沒有「不凝於物」的度量，他就是「一死」，不能叫未死的世人「清」了，世人終久不能為他的一死而變「醒」了，雖死又何益？這我覺得是備於「癡」的缺點，也就是我們湖北人的一般缺點。

第二個缺點，就是「狂」，楚人「狂」的特性，遠在春秋的時代，就成立了，我們知道「接輿」看見當時國君，昏暴不可有為，伴狂而歌，所以當時有人賜他一個徽號叫「楚狂」，後來最能代表「楚狂」的人物，要算「項梁」。說到項羽這個人，本來其先人的原籍是江蘇滬寧遷縣下相的人，何以說他是楚人呢？這個原因很簡單，就

是因爲他的祖父項燕以上世世爲楚將，到項羽出生時，早已就遷居於楚多時了。何以見狂呢？當其他與其季父避仇吳中時，看見秦始皇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羽俱觀的時候，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也」，以一避難異鄉之少年，當着強秦暴虐之秦始皇，說出這樣話來，非狂而何？不獨得來，而且做得出，後來果然起大事，定江東，拔襄陽，斬宋義，執懷王，而推翻了秦二世。太史公曰：「當是時，「楚兵」冠諸侯，「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鉅鹿之戰，諸侯軍見「楚兵」呼聲動天，無不人人懍恐，一則大破秦軍再則大破漢軍，「狂」得不一樂乎，不但項羽個人是「楚狂」，當到大業舉事之初，楚人的作風，是很有精采特色的，所以太史公作項羽本紀，極力描寫「楚狂」當時的「進取」精神，同時處處在替「楚狂」的「自矜」，「不自責」，「不師古」，「奮私智」，「欲以力征」，不能持續其進取精神爲可惜，故其言曰：「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譁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這是描寫讚嘆「楚狂」的進取精神之一段；接着又說：「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能自立，發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

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這是太史公惋惜「楚狂」的一段公道話，也就是「楚狂」作事失敗的原因。太史公這一段話，不獨是惋惜當時已經失敗的「楚狂」，而不當是惋惜或警戒以後的「楚狂」，假如不信「楚人」失敗的原因，大半是「狂」的話，我又可舉出一個「楚狂」出來證明。誰？就是陳友諒。

陳友諒是湖北沔陽人，他是一個漁家子，其出身，其家世，不及項羽遠甚，然而他竟能深明大義，慨然有一種民族革命的思想，力圖先復漢族，推翻蒙元，其前後大慨事略，恰與項羽大同小異，譬如項羽稱王於彭城，陳友諒則稱帝於采石磯，羽殺宋義（卿子冠軍），又放逐懷王，（義帝）與陳友諒殺徐壽輝，又殺倪俊父相類似，項只號楚，而陳則號其國曰大漢，改元「大義」，東襲金陵，凡立四年，及朱元璋起，諒猶大舉拒之於鄱陽湖，這種進取精神，起初莫不令人望風而靡，而其後，卒亡其國，身死鄱陽，假使太史公再世，一定也要替他惋惜，一定也不外是用「自矜功伐」，「奮其私智」，「不師古」，「欲以力征」，的一套，來求全他，這話如果大家認爲可信，那我們便更信「楚人」敗失的原因之所在了。

自古以來，成者謂之王，敗者謂之寇，誰看以誰是真王，誰以爲誰是真寇，假如劉邦與項羽一交換，陳友諒與朱元璋一交換，設或當年的「炎漢」即是「大楚」，「大明」即是「大漢」了，有爲者，亦若是。問題只是誰的自身比較健全，誰就成功，誰的自身比較不健全，誰就失敗，我們湖北人每每在大業舉事之初，是很有精采可觀的作風，是很有勃勃蓬蓬的正氣的，一到功虧一簣或是功成果滿的時候，不是中途跌蹶，就是斂迹消聲。這個原因，固然是很複雜，但仔細從過去的事實來研究，還是不外上述的兩種病根！「狂」與「獵」。

我們如果相信這個「狂」「獵」，是我們的病根，我們要研究這病根的內容及其對於人們社會有沒有什麼妨害？這個問題，很可以引一段先賢的座談來解答。萬章問孟子道：「孔子在陳，曰：『盜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答道：「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獵乎，狂者進取，獵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萬章再問：「何如，斯可謂狂矣？」孟子答道：「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萬章又問：何以說他們是狂士？孟子答道：「其志也，然，（就是志大言大的意思）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就是坦白的意思）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就是不屑去做不潔的人）是獵也，是又其次也」，這一段座談，簡直是

說明了「狂」的含義，「獗」的內容，分別不過是在孔子所希望的「狂」「獗」，是對「學道進德」者而言，我所提列的上面的「狂」「獗」，是就「立功修業」者而言，總之，我們因此可以明瞭「狂」的含義，是「進取」，「志大言大」，「很坦白」，這是從好的方面看，再從上面幾個先輩「楚狂」的事實中尋找一些不好的病態，就是「自矜」，「不自實」，「不師古」，「奮私

智」，「獗」的含義，「有守」，「有所不為」，「不屑不潔」，這是從好的方面看，再從上面所提的代表「狂獗」的人物事實中，我們又可找到一些正而不中的病態，就是「悲觀」，「憤世」，「嫉惡如仇」，「消極」，「憂鬱」，「無所作為」，現在把它歸納起來，列成一個很明顯的表解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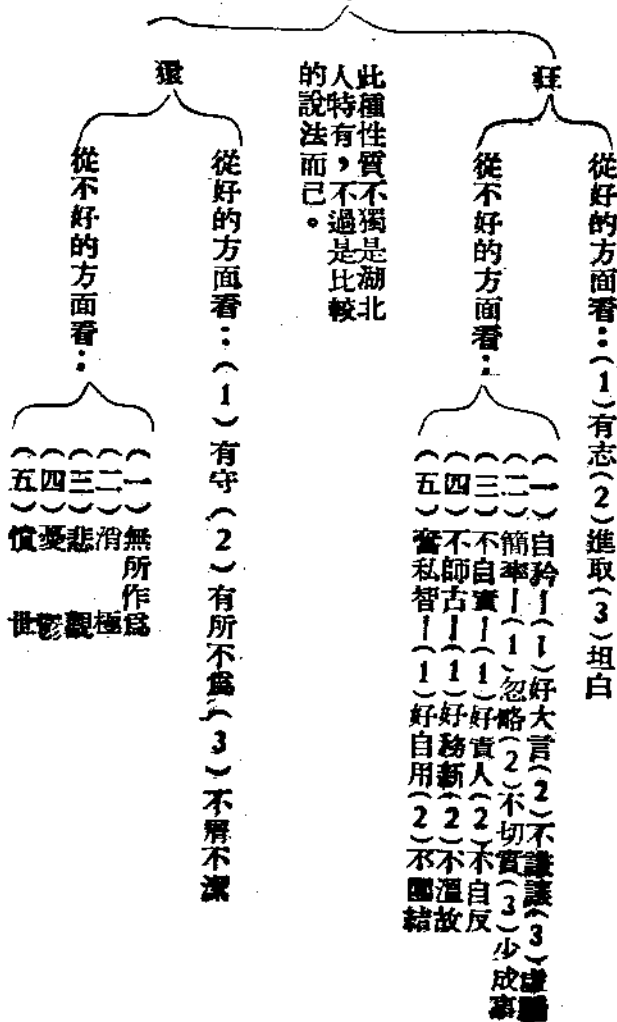
頗能代表湖北人的歷史人物

- (正)而 不(中)的狂者——項羽，陳友諒
- (正)而 近(中)者——張居正
- (正)而 不(中)的獗者——屈原，費元洪

(張居正)在湖北人中是比較成功，他在明朝神宗的時候，一連做了十年相業，飭吏治，整邊備，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所以海內大治。

(費元洪)屈原大夫的獗，是由於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史云：「原雖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可見他是狂而獗者，其所消極者，由於積極之不可行也，惜哉！以黎元洪之賢，處可有為之勢，而踴躍涼涼，蹉跎荏苒，無大建樹，即其辛亥起義，亦不過故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耳，誠為可惜也，故列為獗者之流。

湖北人的一般特性



我們要知道，狂獗並不是壞人，在尋求中道而不可得的時候，還難得找我們能狂能獗的人，最壞的，最怕的是那種「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非之無舉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的」鄉原——故孔子罵鄉原為德之賊。「止謗莫如自修」自修莫如自反，自反莫如自檢，檢而後能反，反而後能修，修而後能正，正而後能中，天下事，未有既中且正而見有橫逆之來者，所以我們先將我們的缺點，來一個「自我檢討」，在上面表解中，我們自己看得見自己的毛病，然後各人對着自己的毛病，來一個「自

我反省」，所謂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然後再來一個「自我修正」，如果我們把這三段工夫做了之後，還有人向我們無理取鬧，怎麼辦呢？孟老先生有一段名言，很可以作我們湖北人一個參考，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者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也，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今我們湖北人，大家來一個「自我檢討」之後，如果有人於此，待我們以橫逆，我們還是來一個「自我反省」，我必過狂也，我必過獯也，如自反而不過狂矣，自反而不過獯矣，其橫逆由是也，我們還是來一個「自我修正」！我必自矜也，從而修正之，我必簡率也，從而修正之，我必不自責，從而修正之，我必不師古也，從而修正之，我必奮私智也，從而修正之，其於

獯者亦猶是。如果自修而改正矣，其橫逆仍猶是也，然後我們來一個「反橫逆的總動員」，或者叫做「反妄人的總動員」，所謂是「惡聲至，必反之」。

這樣一來，「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們湖北人以仁存心去愛人，以禮存心去敬人，如果愛人不親或是禮人不答，我們又從而反其仁，反其敬，再有不親不答，我們又從而修正之，我想最後總可保證能親能愛而至於融和，湖北居中國之中，東西有長江漢水為之通，南北有平漢粵漢之貫，四方之士，亦樂於易於到湖北，湖北人亦樂於易於到四方，所以湖北人幾幾乎足跡遍全國，而南洋歐美，亦無不有，於是我常常想，湖北人之在地，正如鳥之在天，何處之天看不見鳥？正如何地看不見湖北人一樣，因此，或者有人說：「天上幾多鳥！地下湖北佬」，起初是借來形容湖北到處有人的話，後來或者有一些玩世不恭的人把這句話一變，變成玩狎的「天上九頭鳥」。我想這是無關大體的話。

倒是顏君悉達所提出來的「關於湖北人」一

文中，最有意義的，是把湖北比做人身的心臟，而有重觀的必要，在這個必須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時候，顏君提出這個問題，是最迫切，而我希望於全國同胞的三點：（一）不獨不可歧視湖北。（二）大家應正確認識湖北人是富有調和性的優秀人羣。（三）大家要拋棄私見和成見，竭誠的與湖北人合作。這就是說希望大家要把湖北當作自己的心臟，來愛護，來合作，來認識。這一點我認為如果大家是想「中國一人」的話，是應當如此作，同時，我們湖北人應當需要自己體認自己，來一個「正心運動」，所謂是「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所以我們在私的方面，要各人正各人的心，在公的方面，要各國正各國的心，然後才能達到天下一家的目的，不過我們在正心之前，還得要先誠其意，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我們這篇文字，謂為「自我格物」也可，謂為「自我誠意」，亦無不可，謂為「中國正心運動的先聲」，更無不可，大家覺得需要一個正心運動嗎？

走向農業機械化的前途

(續)

黎少岑

五、茅草根的問題

在我們同那些從事工作的中美人士，一塊兒檢討業務成效的時候，又接觸到那個我們所認為頭痛的茅草根的問題。茅草根長得太深，只能把它從中斬斷，無法把它剷除淨盡。本來這一種犁和耩耩齒，已比一般的犁耩，可能耕得更深，但也只能耕得大幾寸深而已，不能超過一尺；再說也不宜於在一次把土壤翻得過深。不過依我看來，此地茅草根是不會長得太深的，原來茅草根之所以深，是爲了要吸收地下的水分；這裏的土地似乎並不十分乾燥，茅草根總比乾燥地帶長的較淺，多經過幾次的犁耩，永遠不讓它長出地面，則即使它有從地下最深層吸取水分的本事，接觸不到日光和空氣，慢慢也會腐爛掉的。



曳引機拖着犁耩

農復會的委員李範一先生，提示工作人員，在第一年中寧可不從收穫量上打算，多種點豆科的植物，只要在這一年中用豆科植物的藤和葉把茅草悶死了，以後便可以長治久安；不然，每年中都讓作物來和茅草作生存競爭，永遠都難有豐收的希望。當然爲了要提高農民的信心，并起一點示範的作用，似不宜過於犧牲耕作的收益；因爲貪近利是人之常情，不能教每一個人都看得這樣遠。李先生還說到蘆柴根在有些地方，要比茅草根還難對付，反而是那所謂霸王兒子，長成一大堆，倒容易給它一口氣和根拔盡。

據那位從事農作的黃國華君談稱，在未開墾之先，曾放火將茅草和蘆根

燒過一次，火耕水耨，原是最原始的耕作方式，使用曳引機，又是最新式的耕作方式，把這兩者在同時間施用起來，這說明了今日從事農場經營的工作，是何等的艱鉅？一方面要接受老農和老圃的經驗，一方面又要學習現代的知識，一點也馬虎不得。

在耕作時，有許多要注意的地方，深耕固佳，但完全把表土翻到底下去，把底下那未經過氧化的土壤都翻到面上來，也不適宜耕種。又如地面上的草皮翻了下去，土壤中形成一道間隔，使水分不能自由上下，也是一項缺憾，必須要使那一層草皮和土壤能癒合一氣。還有新播種下的種子，每易被鳥雀啄食；這一些子問題，都要仔細加以研究。

同樣的問題，在我們的面前，是只能消滅地底處理着。譬如茅草根的問題，在旁的國度裏，是如何利用茅草根之能透入土壤的深層，吸取水分的這一特性，設法使它和麥子雜交，造成一能够抗旱的新種；而我們所研究的，則僅爲如何去防止茅草之威脅作物的生存而已！在與自然競爭的場合之中，遠處於一個被迫採取防禦的劣勢。假定我們現今已經有了這一和茅草根有着同樣生存能力的新種，把它從地而上種下去，而那被斬斷了的茅草根，可不得不從地而下七八寸深的地方，慢慢地長了出來，這樣一來，那裏還有任茅草根蔓延的餘地。

周夏兩技師正在改裝中耕器，以便鋤草。中耕器是預備在農作物長成後從事中耕的；鄉間在作物長成後用鋤頭除草，或在水田中用腳將草根絞斷，便算中耕。中耕器每隔一個相當的間隔，裝置有兩塊鐵板，以便保護作物，鐵板兩側，各有一簾，用以鬆土鋤草。橫簾上鑿有一行孔槽，間隔可以隨作物之行距，酌量調整。現在的辦法，是將那所有的鐵板都一概除去完全密集地安上鋤頭，預備去播種以前，再把那尚未犁淨盡的草根，再鋤一次。

犁上附有兩個犁頭，兩個有銳口的圓輪，另外還有一個和碟耙的碟一樣，安置得與地面正相垂直的圓板。在犁作時，曳引機的輪子，在地面上劃出一條深溝，這圓板恰好緊貼著那深溝的一面，使得那犁頭所掀動的土塊，限於圓板的內側。曳引機向前行駛，兩個圓輪便在泥土上劃開一綫，犁頭從後面來一掀，泥土便成塊地被翻起來了。此時在內側輪迹，已給犁頭擊鬆了，那外側的輪迹，則恰好成爲已犁與未犁之間的一條界綫，回頭來再犁，只須將內側的一輪，合上那一條原有的外側的輪迹，土地便一行挨一行地犁出來了。平均八小時的工作，可以耕出田二十五畝，或耙好田八十畝。

六、做總比不做好

合作農場包括有五三、六月，一五、九人，據最近重新調查的結果，有六七九戶，二、〇〇〇人。本來現在是按人口發給救濟糧，將來還要按畝數分享收益，但農民還是寧願少得，不放心把戶數和畝數登記，即不看到這並非爲了抽丁徵糧，又來紛紛請求補登。輔導處設有組訓股，組訓股負責的彭壽君，係中國大學畢業，曾任教職多年，對於此番組訓的工作，即頗感頭痛。我們認爲這首先還得要正一次名才好，這決不是訓的問題，而是要取得信任的問題。人民知道得太多了，我們也訓得太久了，最大的困難，是他們在聽過若干次不兌現的諾言之後，不容易再發生信心。

合作農場估計共有田二萬畝，因爲以前犁頭太少，在我們參觀的時候還只耕了三千畝，這個把禮拜，據報又耕出了二千畝，一共耕出了五千畝，近來又聞已耕到七千畝以上。合作農場的場長是由當地的樸孝林君擔任，全場分爲八領組，每領組兩隊，其間只有一組的人數較多，分爲三隊，總共是十七隊，各隊按區域分配鋤草播種的工作，事先分配停當，作集體的勞動，以便配合得上曳引機的速度，逐漸推廣耕作的面積。最近爲了提高工作的效率，規定在組與組，隊與隊之間，舉行工作的競賽，結果工作的效率是提高了，果然會有兩個農夫，一個農婦，帶着一個幼童，所作出的工，竟比以前十

個成年人所做的還多。

勞作的分配，是每一成年人，每月担任八個工作日，每一個小孩担任四個工作日。在繁殖期間，每一個成年人每月可以領到救濟物資計麵粉六十斤，每一個小孩可以領到麵粉三十斤，目前麵粉的存量，預計還可以維持到收割的時候。這一種待遇，比較一般補助復耕的辦法，似較爲優厚。不過，這也只怪我們的農村是太窮了，其實要維持一個足夠的生活，並進行擴大的再生產，這一點的救濟物質，似乎也不嫌過多。何況於是按救濟的辦法，就是不工作，也一樣要給予這樣的分配。



麥雄的把碟

問題還在於規定的工作日太少，即使是不增加的話，對於那一個家庭中所能參加的工作，仍必須由其家屬代爲完成。再則那在合作農場中負責的十一位，可以脫離勞動，似還近於情理，但如果是，連他們的家屬在領得麵粉之後，都還可以不勞而獲的話，也就有點兒勞逸不均了。關於這兩點，善救分署第一工作隊的隊長陳英武先生，曾表示這很有考慮的必要。

漢口中農行的副理張克明先生，憑着他那十餘年來辦理合作事業的經驗，提供了幾個很寶貴的意見。他認爲業佃關係之如何建立，地產憑證之如何提供，土地與勞工報酬之如何標準，收穫物之如何處理與分配，事先均應有一個明確的規定；這樣在金融機構，也容易了解這一合作農場的資費和損益的情形，貸放的手續，也將要方便得多。

當我們參觀的時候，已經種下的有高梁一千二百畝，飯豆和花生各五百畝，黃豆三百畝，棉花和芝麻各二百五十畝。此外還種了湖桑二千株，實生

桑七十包，約一萬餘株，美國菜十畝。輔導處中并開有蠶室一間，有一位李小姐在那裏從事養蠶，蠶種是中日混合種，據李小姐談稱，溫度以七十五度為最適宜，濕度以比溫度約少四度為準；室內經常用焚燒粗糠來調節溫度，空氣頗感悶，由此可見李小姐的工作，是相當的艱困。此時蠶還在二眠期間，已經有了二十張，將來還得要擴充養蠶的處所。最近據輔導處的陳副主任兆耕談稱，蠶絲已有收穫，繭為純白色，繭層較土繭為厚，計上繭四百四十個方有二斤，改良繭只要三百七十個便重一斤，土繭一斤可繅絲一兩五錢



合作農場成立之一幕

，改良繭則可繅出二兩五錢。推廣改良蠶種的時候，爲了顧慮調節溫度的困難，可利用大祠堂廟宇，在三眠以前，集中飼養，三眠後按比例分回飼養。

本來在全面不景氣的情形之下，不容易單獨建設起一個理想的農場。此地離襄河約數里之遙，在灌溉時既無法取水，在河水泛濫時又會有淹沒之虞，平時間水利不興，儲水洩水，兩無善策，非旱即潦，偶有水患，或天久不雨，便要前功盡廢。其次，如果社會的秩序一欠安定，也會影響到工作的進行；最後，關於農產物的銷售，也可能受國際上大量傾銷的打擊，結果甚至於還要賠上血本。

不過，回頭一想，做總比不做好。

在水利方面，有這樣一個集體的力在道裏，對於防洪方面，多少總還要有裨益。橫直旱潦之災，即便是在分散耕作的時候，也同樣是要發生的，現在至少還可以多有一分防禦水患的措施，甚至於還可以興辦水利，如輔導處最近即擬在附近開浚一條八里長的水溝，以便灌溉。

關於社會之安定與否，無論是來自何因，當地的人民生活之改善，總不失爲一最大的安定因素，它可能和協於內，抵抗於外，在分散耕作的時候，沒有團結的農民，簡直是柔羊一般，任人宰割；現在由於集體的工作，增進了相互間的情感，也就可能增加了守望相助的力量。

再談到國際傾銷，其所給予單獨農民的打擊，總比那給予那合作農場的打擊，要來得重。利用合作的組織，集體的力量，與一部份農貨的通融，可能把那所將遭遇到的打擊，縮小到一個較小的限度。

總而言之，做總比不做好。

輔導處的主任余廷獻先生，是金陵大學的農學士，歷任省農學院的教授和省高農的校長，現調任農業技正，由吳顯忠先生接充。副主任陳兆耕先生，是四川大學的農學士，曾經在重慶南岸辦理過合作農場。農事股股長黃國華先生，也是金陵大學的農學士，曾在農技界服務多年。和我們一道兒去參觀的陳大容先生，也是一位農學士，在鄉村建設學院教過書，對輔導處的工作同仁，曾講述了晏陽初先生的一番經驗之談，那就是說，不要忽視人民自身的力量，不要不痛不癢，怕發出了麻煩。

談到農作的情形，據黃國華先生談稱，此地的土壤性質很複雜，這一點我很相信，因爲在路上所看到的斜向岩石和土壤，隔不得好遠都要變一樣子。黃先生又說有些地方連辣椒都長不起來，似乎鹹質都重，而那些積水的地帶，應該又是酸性。大體上說來，所預要的還是磷肥和氮肥，氮肥是利用糞料，磷肥則分譽已有骨粉的分配。又聞此地還可以出產大量的半夏金銀花和蒲包草。棉花在此地當然也要算唯一的經濟作物，余主任在談到這裏的時候，頗稱道當初陝棉發展的成績；這引起了李範一先生的一段回憶，當季儀社先生修設涇惠渠的時候他正在陝西主持教育行政，可以說從水利的興建，如陝棉的推廣開始，他都是身歷其境。李先生還談到鄉間缺少感力的地方，有人用手耙；這一情形，我在歸途中也親眼看見過了，那是由一個人將一面寬不過兩尺的耙，垂直地插入田中，另一個人在前而用繩子向前拖去；比起那

二十八片碟耙，隨着曳引機而運轉如飛的情形，真是太可憐了！人力既相當缺乏，使用又不節略，無怪乎荒田之日見其多；空口談建設有什麼用？爲什麼我們還不趕快走向農業機械化的前途？

在我們的遊程中間，在沙洋市上，看到了許多廢棄的鋼軌，車架，石印機和其他廢亂的機件。在應城，曾看到了一全部被廢棄的麵粉製造機，和一座製冰機與冷藏器，附帶還有幾個裝置壓縮鋼筒；此外我們還在一些正在修復的工廠之中，如皂市米廠，應城民生工廠，與應城榨油碾米合作社中，都會看到了一些廢舊的機件。在一位旅伴陳工程師家裏的一件廢銅破鐵都像寶貝；我們也同樣對於那些機件，有着徘徊不忍離去的心情。中國實在太窮，而我們那些「叔收」人員的眼光又未免太大；比起他們那大的眼光看來，我們之對於這些廢置的機件之感覺流連，實無以異於一個拾垃圾者在翻得一個瓶子或布皮之後的喜悅。我們真不知失去了多少的機會，糟踏多少有用的物資；使得那真正肯作一點事業的人，到今日連破銅廢鐵都感覺到不可多得。

合作農場裏所種下的高粱，已經在發芽了，專門埋頭從事機工和農事的工作人員，竟然忽視了一個極嚴重的現實，那就是說公路兩側，曾規定了不得種植高粱，以防青紗帳起。負責的陳兆耕先生，直到回漢口述職的時候，才聽到旁人說有這樣一個規定，在重返沙洋的途中，我看到他無時不爲這一難題所困惱；他既不忍心把他那費盡血汗的農作物從地面上拔了起來，又不知道將要運來一個如何的後果，假如在此次的參政會中，真能爲吾民

求得一個太平日子，陳兆耕先生也就再不必爲這一高粱的問題，感覺頭痛了。

是的，做總比不做好；只是天下如果還是難得太平的話，困難是極多的。如何使零星的私有土地，拿來集中地使用，並使農民相信這既不損於他那私有土地的權益，而且還可得到許多集中使用的好處，便須要有一個長期的耐性的艱困工作，做出輝煌的成績。一點點顯明的事實表現，勝似過千言萬語的宣傳。認爲這一個合作農場的土產以純屬公有爲宜的見解，我實在是不敢苟同；因爲那樣一來，對於這一個農場是好辦了，但就其示範的意義來說，則實顯其純屬私有。做起固然要困難得多，影響可也要大得多，一參加合作農場的土產所有者，在發展合作農場的過程中，對於其他的土地所有者，都會成爲一個好的榜樣。眼看著沿公路兩旁，滿佈着野生的薔薇科的植物，風吹來陣陣的香氣；有一段的路上更是特別的多，即在都市的花園中兜風，亦難有此優美的享受。看一看廣漠的熱荒，看一看這一條清香濃郁的玫瑰路，想到植物的自然蕃殖力之是如何地頑強？而我們這從事農作的人力，又是何等的脆弱，愈覺得今日實必須運用農業機械來增強我們這復蘇農村的力量。

作者附註：前以文稿潦草，上篇手民誤植甚多，如「銘」之誤作「鉛」等，其他讀者可以意會者，恕不一一更正，並希見諒！

先有人民、而後有政府，初無人民、焉有設置政府之必要。蓋人民爲根本，政府爲枝葉，枝葉豈有不從根本者乎？

——巴庫爾

一國之主權，爲國民所公有

——盧梭

詩二首

鶴西

夜

夢中我到一座城
數我朋友們的故居
我從那裏聽見說
他們有人不在了
有人離去還未回

我踏過縮塵的街巷
嘆息一日的白天留下這許多車跡
這棵樹我知道是孩子們和打糖繡的
夜深了

讓我這大孩子坐——打個盹——休息
又踏上縮塵的街了
脚下是樹的影子
月亮吻着我
流着淚說
你回來了

我替你看這遠處久
這故城的寂寞

共壽田談贈樹德

兩人正商量着去遠方
遠方的
可愛的船
朋友的信也是一隻
航到我們的窗前了
誰說還不是他的船
金沙江
昆明池
瀟湘水
大江東去到石頭城
一個人航行得這樣遠了
這隻船也該送給老朋友了
我們真買棹而去麼

時論選輯

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學生運動

Charles J. Canning 作

最近學生運動遍及全國，他們罷課，開會，示威，乃至舉行大規模的反內戰反俄遊行，不僅使政府張皇失措，在國內形成了某種政治危機，而且在國外引起了普遍的注意與評論。

敏銳的政治觀察家，都非常重視這次學生運動。一般都認為這次學生運動，給與了我們一個指標，指示出中國政治之風，究向何方吹去。這個理由並不難找。只要稍一閱讀民國建立以來的現代中國史，就可以發現在中國國內政治方面，學生扮演最顯著的角色。事實上，在中國，學生運動被看作政治的晴雨表，已經由來已久了。近三十多年來，中國政治上的每一次影響深遠的變革與發展，都一定有一次突發的學潮作為前驅。在公眾的限裏，每一次遍及全國的學生示威與罷課，都是無誤的暴風雨信號，迫近的政治動亂的前奏。

知名的歷史家，現任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博士，在接見聯合社的記者時說：

「古今中外，凡是政治不能令人滿意，沒有

用民主方式傳達這種感情的可能的時候，倡導政治改革的重担，常常落在受過教育的青年的肩上。自漢代以來的兩千年的中國歷史，完全證明中國的學生運動合乎這條規律。戊戌維新，是公車上書的結果。同樣的，建立民國的辛亥革命，完全是一個學生運動。最後，民國十四年至民國十六年的國民革命，也是一次學生革命。」

中國的學生運動史指示出，每一次學生在學潮中所提出的口號，都真實地反映出人民的願望。它們是人民的聲音。學生們在當時也許因提出這些口號而遭受苦難，但是遲早他們的口號總是成了納國事於正軌的戰鬥召喚的。

我們用不着向中國歷史裏追索很遠，去尋找證據。兩件事實就可以充分的加以說明。

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前夕，華北的學生，發動了一次劇烈的學潮，反對當時在軍閥官僚掌握中的貪污腐化的北京政府。在這次學潮裏，學生被認爲「赤化份子」與「過激份子」，而且被他們用對待赤化份子與過激份子的手段對付了。

有一些學生作了革命祭壇上的最高犧牲。可是，北京政府終於被推翻，而學生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另外的一個例證。民國二十幾年，日本向中國，接二連三地，提出了許多要求。當時北平的地方軍隊與政府當局只知向日本小鬼叩頭。有一個時期，華北大有被日本不費一彈地併吞了去的可能。就在這危機的轉捩點上，中國的學生，尤其是北平的學生，高喊出了抗議的呼號。他們要求，對於日本的侵略，放棄不戰而降的態度，採取堅決的抵抗。

因爲他們的抗日活動，學生又被宣稱爲「共黨工具」與「赤色秘密活動份子」。他們飽嘗了大刀，槍托與水龍的滋味。但是最後，政府終於被迫放棄了它從前的不抵抗政策，改採了久已爲學生所要求的路線。又一次，學生的口號，佔了優勢。

正由於這個原因，有眼光的政治觀察家們，以最密切的注意，注視着這次學生運動。

在這篇簡短的論文裏，我不打算追索學生運動的發展及背景。我所要作的，只是指出這次運動的幾個特點。

就我所知，這次學生運動的特點有下面幾個：

第一，這次學生運動，較之我們過去所目擊的學生運動，範圍更爲廣大，情況更爲激烈。過

去的學生運動，大半都局限於少數的大城市及著名大學裏。在抗戰前，學生運動總是由北平和上海首唱，然後蔓延到天津，武漢，南京，廣州和杭州。邊遠省份，如雲南貴州廣西山西的大學與其他學校，通常是不受影響的。

這次却不同了。這次學潮真是如字面所示的全國性的學生運動。在兩個星期之內，學生的罷課與反內戰反饑餓示威，不僅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及武漢等大城市裏爆發了起來，而且像野火一樣地蔓延到了瀋陽，開封，青島，濟南，西安，長沙，桂林，貴陽，重慶，昆明，成都，南昌，九江，安慶，蕪湖，蘇州，無錫，杭州，福州，廈門和廣州。

所有著名的有歷史的大學，像北平的國立北京大學及國立清華大學，天津的國立南開大學，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廣州的國立中山大學，上海的國立復旦大學及國立交通大學，杭州的國立浙江大學，武昌的國立武漢大學，都被捲入了。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的政府大學都成了這次學生運動的積極參加者。

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上海的國立交通大學以及西安的國立西北大學，一般都看作國民黨在教育前線的防壁，居然也成了這次學生運動與反內戰反饑餓示威的攻勢的戰鬥的領導者，尤其具有特殊的意義。

這次學潮，還不僅局限於大學學生。很多中

學與師範學校，也參加了。據報載，有一個時期，在上海有四十個以上的中學，在昆明有三十個以上的中學及師範學校，加入了罷課。

學潮爆發以來，已經將近兩個月了。許多學校還在罷課。在上海，復旦與交大的教授，罷教表示同情他們的學生。一直到現在，我們還看不出有什麼根本解決的辦法。也許這次學生運動，比過去的所有的學潮，都要維持得久些。

其次，過去的中國學生運動，除了「五卅」之外，大半是學生與知識份子的孤獨的前衛戰鬥，因此，沒有其他社會階層的積極的支援。可是，這次學生運動，却是一個全國性的羣衆運動之不可分的部份。如衆所週知，這一次的社會動亂開始於杭州，上海，南京，蕪湖，福州與成都各地的搶米風潮。接着是上海杭州工人的要求生活指數解凍的罷工示威巨潮。最後，學生罷課示威運動就爆發了。

和搶米的窮人及工人一樣，學生在初期的罷課示威裏，所提出的要求是經濟性的，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副食費與教育經費之增加，南京中央大學，青島山東大學，瀋陽東北大學經濟要求首先是教授提出來的。後兩大學的教授會，爲了加強他們的要求，首先號召罷教，而中央大學的教授們，則在一個措辭尖銳的宣言裏，聲稱如果他們的要求，沒有結果，將採取「適當的行動」。

這樣看起來，很明顯地，這次學生運動是一個全國性的羣衆運動之一部份，在這個運動裏，所有各界人民，學生，教授，工人，甚至於公務人員，都參加了。五月初，青島與漢口的公務人員中間，流行着聯鎖信，並且發表得有公開宣言，要求調整待遇，同時公開的威脅說，假使不理會他們的要求，他們就要「總請假」。在這裏，我們稍稍回想這件事，是很有興趣的。

據報載，就在首都，有幾百個退伍陸軍軍官，列隊到中山陵去「哭陵」。他們的領袖在記者招待會說：「我們活着總得有吃的，死了，也得有口棺材。」他們全體都是將官階級，之所以這樣作，據說是對於他們畢業中訓團，遣送回籍的前途，感覺絕望的緣故。

對於全部形勢的客觀分析，顯示出這次學生運動，密切地與全國性的求生存的要求運動聯繫着。由於生活指數的及時解凍，工人騷動逐漸平息了。可是因爲許多要求懸而未決，學生還在繼續戰鬥。

在這種情形下，學生運動漸漸帶有政治性，是無足爲怪的。歸根究底，學生較之工廠工人，更有教養，更明世事。在他們的要求被拒絕，他們的希望被粉碎的時候，他們自然要苦思焦慮以求尋找出一切的究竟的。

他們尋找出了，內戰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們就提出了「停止內戰」和「立即恢復和

平」的口號。

大多數的中國人是毫無疑問地反對內戰，希望和平的。學生們提出這兩個口號，正喊出了人民心裏的願望。

在中國，和平與統一的鬥爭是發展得很慢的，但是有其堅實基礎的。正像在過去一樣，事實證明學生之正確的時間，已不遠了。因為和平總究會來的，不用什麼方式。

第三、這次學生運動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公衆的同情完全在學生方面。在北平，北大清華燕京的五百多個教授，發表公開宣言，表示他們對學生的同情，同時駁斥說學潮是受共黨操縱的造

謠誣蔑。在上海，許多大學的教授也採取了同樣行動。這些教授們並不是在「領導青年，誤入歧途」，他們很懂得，他們說的是什麼。他們的宣言，較之不負責任的，淆亂聽聞的宣傳，和大量被收買的言論，更有力量。

另外，立法院，參政會和上海市參議會，在他們各自的會議裏，爲學生的行動辯護，並且建議審慎地，冷靜地對待學生，有些立法委員和國民參政員，特別辛辣地猛烈地抨擊用高壓手段壓制學生運動。

集團逮捕與說學潮受共黨操縱，對於政府，

有害而無利。壓制手段，只有使學生愈加激烈，愈加憤恨。

如果中國的學生運動史教訓了人們什麼事，那就是，一旦男女大學生離開教室，跑上街頭，叫出反對口號的時候，一定有某一些事確實是對的。當青年人發動一個遍及全國的運動的時候，一定有些事是值得鬥爭的。歷史切實地昭示我們，任何被學生所擁護的路綫，遲早是一定勝利的。

難道歷史會重演嗎？

(譯自六月十四日密勒氏評論報)

自由，如樹也，惟遇暴君之血濺漬時，方能生長。

——勃雷埃

非以民望爲城砦之政府，其政府必不鞏固。

——尼波斯

優良之政府，不害一人。

——左薩

湘芬書局

本局三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奉 湖南省教育廳未鳳三字第一三零九七號通知轉奉 教育部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國字第四六四三八號指令特准印行國定本中小學教科用書其售價悉依 部令之規定

供應大批 白報紙 印刷精良

國定小學校課本，
各科參考圖書；

統辦一切：文具，儀器，體育用品。
發行 定期刊物，經售 中西雜誌。

學校採用 同業批售 特別優待
外埠函購 售價克己 負責運送
目錄備索 如蒙惠顧 無任歡迎

湖北區 漢口交通路
武昌中正路

湖北論壇約稿簡則

- 一、本刊為社會性刊物，言責作者自負。
- 二、本刊之宗旨在於研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之理論與實際問題，謀健全輿論之發展，藉以促進地方自治及民主制度之建立。凡適合此旨趣之文稿均所歡迎。
- 三、本刊歡迎下列三類文稿：
 1. 研討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理論與實際的論文。
 2. 敘述本省各地政治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社會等實況的通訊。
 3. 短篇文藝作品。
- 四、論文每篇以四千字為原則，通訊與文藝作品每篇以二千字為原則。
- 五、來稿文體以語體文為原則，淺近文言亦間採用。
- 六、文稿須用有格稿紙，抄寫清楚，標點亦佔一格。
- 七、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事先聲明。
- 八、各類來稿均須作者署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否則不便登載。
- 九、來稿登載後其版權仍為作者所有，但如本刊彙印叢刊時，得自由編纂。
- 十、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酌致稿費一萬至一萬五千元。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一四六號
 湖北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三八號
 中華郵政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湖北論壇

第二卷 第七期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

發行人 劉叔模

主編人 湖北論壇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及定購處 漢口湘芬書局
 (漢口交通路廿六號)

印刷所 湖北民生印刷公司
 (漢口生成南里十二號)

特約經理處 黃岡黃岡書店
 沙市啓文書局
 施南商務印書館分館
 老河口良友書社
 鄖縣中國文化服務局

分銷處 武漢及各地大書店

訂戶 預收刊費國幣壹萬元
 本期售價國幣二千五百元
 期八折優待